

独立阅读

2007 年 9 月

细则

- 1、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作者名单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李冬君（天津）、刘柠（北京）、汪伟（上海）

编者按:

诸位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八个字长得像绕口令一样,需要有特别的肺活量才能一口气说完,因此,从本期开始,标题缩减为“独立阅读”。由四位观察员撰写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将继续保留,作为“独立阅读”的一部分而存在。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无论编者还是作者,都无意于也不可能垄断“独立”两个字。恰恰相反,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这两个字。陈寅恪先生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众所周知。这里,我们还想重读他的另一句没有成为名言的名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进而言之,我们亦可说:“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优美之文字”,正是我们期待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然,以上均属对未来的想像,“独立阅读”在近期所能做到的是从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做起,尝试建立一套独立的书评程序。

最后需要道歉的是,限于精力,译著未能如部分海外读者所愿一一标明原文,由此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戴新伟: 写作

苏小和: 经济

成庆: 思想

王晓渔: 文史

专题

吴强: 抗争与民主: 蒂利对法国、英国民主道路的解读

羽良: “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

书评

严飞: 中国打工妹: 失语者的呼声

张昕: “竞争”与“稳定”的悖论

李冬君: 关于《叶隐闻书》和武士道

刘柠: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成庆: 音乐就是自我殉道

话题

莫之许: 最后的出版人

声色

汪伟: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

推荐

[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杜小真、顾嘉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7月,13.5元。

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书,“翻新”将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读到它。

[德]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散文、诗与画)》,窦维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33元。

《堤契诺之歌》里袒露的不仅是黑塞的个人灵魂生活,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20世纪初的“编年”。

[苏]塔可夫斯基:《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周成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38元。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电影导演,所遇到的官僚体制阻力。

[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定价,23元。

米塞斯教授的主题是,官僚体制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真正病因,这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异曲同工。

[美]华尔特·罗斯托:《概念与交锋:市场经济60年》,王琛、邝艳湘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6月,48元。

喜欢历史细节的人们,可以走进罗斯托的回忆里,去感受60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30元。

对于浪漫派哲学的系统介绍少之又少,最近推出的《德国浪漫哲学》无疑可以暂时弥补这一缺憾。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07年6月,25元。

值得推荐的是译者吴飞写的一篇长达63页的引言,将《申辩篇》在西方哲学界以及中文世界里的研究状况作了细致的梳理,对于我们无疑是个相当方便的向导。

[美]保罗·斯特拉森:《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马永波、聂文静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36元。

一个家族的历史史改变了一个时代。

张立宪主编:《读库》,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30元。

从一个人主编的定期出版物,可以看出其它很多杂志如何人浮于事。

杨天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晚清史事》、《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国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233元。

不敢说是信史,至少是比较可信的历史。

[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28元。

街区重生,“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因为工作, 因为兴趣, 因为这份每月必须“报告”给来自虚无网络空间读者的报告, 新书是一种汲汲以求的“必需品”。占有是时代征兆之一, 但自我挑选无疑更值得尊敬——哪怕只是不合时宜的旧品种。当看到某书店的新书目里居然有加缪的《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7月), 作为读者, 我确实有惊喜之感, 这意味着不必避忌这是一本旧书, 更主要的是, 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书, “翻新”将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读到它——我指的是上海三联书店这个版本, 而不是坊间各种各样形式名目所出版的加缪散文。这本由杜小真、顾嘉琛翻译的书, 我已经是第二次看到它的重版。虽然后来开始读四卷本的《加缪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并且在这套书里加缪的散文随笔占了两卷之多, 但对我而言, 上海三联版不仅浓缩了加缪散文的精华, 而且具有让人一读入迷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反与正》里对于阿尔及利亚青年时代的追忆, 还是《反叛者》里的地中海思想, 以及少数的艺术批评, 都能让人从不少的方面领悟到加缪的伟大所在——至少, 对于我这样的读者, 首先应该感谢他的散文, 不仅给出了一个与中国(现代)散文比较的对象, 同时也给了一个优秀散文的标杆, 这又包含了一个过去的灵魂可以通过他的文字, 不仅表达自己的思想, 还能表现自己的技巧……

黑塞, 这位德国作家在中国的面世情况与上面那位庶几近之。为大多数读者知悉, 作品一直在重版重印, 各种版本都有(2006年8月上海译文才出过一本厚厚的黑塞中短篇小说选《婚约》)。最近出版的《黑塞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7月)囊括了黑塞最著名的小说如《在轮下》、《荒原狼》、《玻璃球游戏》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散文、诗与画合集《堤契诺之歌》。我无意于对黑塞小说版本评头论足, 以及这些小说对于个体读者的阅读记忆, 所想表达的无非和对加缪的类似——他们的名头固然充满了经典性, 但他们在散文文体上的成就, 却有更多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堤契诺之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1年1月出过精装本, 用的是台湾天下文化公司1999年7月的译本。1919年, 已近中年的黑塞经历了丧父离异的家变, 来到了瑞士南部的小村庄堤契诺定居。在这里, 黑塞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 长篇、诗歌、书评以及散文和水彩画。必须要看到, 在1919年之前, 成名黑塞的中产阶级生活以及整个德国的形式, 一战所给欧洲带来的普遍灰暗精神, 也必须看到, 在《堤契诺之歌》里袒露的不仅是黑塞的个人灵魂生活, 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20世纪初的“编年”。这本书里呈现的, 也不只是一个作家遭遇精神危机的心灵旅程, 当读到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安全感(一个作家经历大劫之后的满意), 哪怕是一些无所事事的描摹, 其魅力却比我们读他任何一部小说



主人翁的危机都要让人感动, 对于今日更加劳心劳力的读者而言, 恐怕也不只是羡慕吧?



《时光中的时光: 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周成林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比《堤契诺之歌》更直面灵魂。必须说明, 我并非塔可夫斯基的粉丝(可以理解为我不懂他的电影), 并不是借此来读这部日记。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塔可夫斯基的身份, 比如他作为社会主义苏联的电影导演, 所遇到的官僚体制阻力, 但同时他的电影在整个国家体制内收到的待遇又与之形成了双刃, 在与其他国家(西方以及日本)的电影体制比较中, 可以看到发生在塔可夫斯基身上的这种身份悖论。

《有人喜欢冷冰冰》(孙仲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是美国小说家林·拉德纳的短篇集, 这位活跃于1900前后的著名体育专栏作家, 结果是以小说之名行世。2007年3月号的《译文》杂志上曾先行过其中6篇, 拉德纳讽刺功力一流, 难怪后世会赠上幽默作家

这顶帽子，然而，幽默作家这种标签恐怕不合他的意，像《金蜜月》这种短篇诚然幽默，然而《理发》这种看得人心痛的短篇，其文学能量也许不是幽默可以涵盖的。依我陋见，作为20世纪初的小说家，拉德纳的身份有其尴尬之处，比如传承上可以说圆满的高潮式结局代表了他小说的大部分特点，然而从影响上说，像《理发》、《冠军》这类反高潮小说恰好代表了拉德纳的文学品质，说不定影响至今——如果定义有一种小说叫不快乐的小说、琐碎的小说的话。但即使在今天，“挖掘”这么一位作家出来，又未必只是走走文学史的过场，我想说的是，这些小说绝对不会是让人硬着头皮啃的小说，而是直到今天读起来依然活泼有趣的小说。不信的可以试试。

以上两本书的译者都是我的朋友，下面提到的这本书，《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花城出版社，2007年5月）所收录的20位诗人，有6位是我的同事或者朋友，但我想小议一下的，是前段时间得奖、受访并且成为不少评论主角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在这本诗集里，她的风头无疑最大，她的诗歌也最特别——这与其说是我受到她得奖等等事件的影响，不如说，那些事件让我们发现了一位诗人而不是她所代表的意义。“打工诗人”这样的名头只能说明今天诗歌在普通读者那里的无所适从，我之所以对这种定位不太感兴趣（其实我反对有什么关系），是郑小琼的诗歌不是这四个字能容纳的——或者说，这四个字只能代表短时期内的文学含量，甚至会沦为一种符号，虽然，所选的26首诗歌里，也有习作。诗人就是诗人。《黄麻岭》、《散步》等诗歌恰当地保持了诗歌与写实之间的距离，并且显示出诗人构建虚构地图的野心。在这些诗歌里，恰好最少“意义”和“观念”。不过，诗歌历来的评述都可以超过读者的想像能力，对这个江湖，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悄悄读诗，不要声张，不要激起大浪。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有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阅读。一是济南的大街上竟然淹死了数位市民，政府不让老百姓背后议论，抓了个散布谣言的小姑娘以正视听；二是山清水秀的凤凰小城一座还没有正式通车的桥垮了，死了很多人，前去采访的外地记者挨了打，省里的党报出台了一篇官员表扬稿，算是对老百姓有了个交待。

这一北一南两件醒目的事件，能反映出当下中国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人文主义者大概能看到那么多人死了，对生命的怜悯油然而生，有新闻理想的人能在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信息被遮蔽的丑恶现象，官员们能看到地方政府一直在沿袭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喜欢经济学的人，更多的则是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纠葛。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下，城市的建设者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城市排水的可行性，而决不仅仅只顾及地面上那些看上去辉煌的高楼大厦；而一家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建筑公司，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大桥尚未通行就贸然垮塌的荒谬事件。这个时候，如果继续在组织的层面、道德的层面、管理的层面、社会稳定的层面、新闻自由的层面去分析，肯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只有让经济学进场，方能认识到如此荒谬的故事之所以连绵不绝，乃是地方政府本是一家公共服务组织，如今却以市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导方自居，将市场里的产权、经营权、知情权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手心里，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目无常识，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继续在现实的层面寻找思路，几乎让人绝望，而经济学则成为我们避难的港湾。新星出版社此次隆重推出的“奥地利学派译丛”，算是在这个多难的季节里为那些思考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美丽的路径。

自门格尔写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算起，奥地利学派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其生命力越来越强大。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面临困境之时出现，其根本特征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它通过对个人的主观认知的理解，来解释经济活动，及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这种新颖的理论范式直接启发了公共选择、宪政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热门学科。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奥地利学派坚持比较彻底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所以，当今世界风起云涌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构成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

推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惠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于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干预的剖析和批判，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首要的研究课题，理应是市场制度及支持它的法治、宪政等等制度如何生成的问题。假如没有一个健全的自由市场制度，主流经济学最关心的“效率”也根本没有落脚之处。奥地利学派对于个人自由、自由选择的坚定信念，奥地利学派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深入讨论，奥地利学派关于制度生成的自由秩序理论，对于中国学者、及普通读者理解中国现实的变化，思考中国应当如何变化，将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回到济南大街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在粗读奥地利学派译丛之后，我们郁结的心思应该会豁然开朗。比如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刘云鹏、戴忠玉、李卫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秉承奥地利学派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的一贯警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细致的归类、分析和批判，对反对自由市场的种种伦理论点提出了反驳，指出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必然会损害正义。还比如米塞斯教授的主题是，官僚体制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真正病因，这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异曲同工。大师们在用深厚的著作提醒我们，发生在济南大街上的洪水事件和凤凰垮桥事件，最本质的原因在政府这里，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参与才导致了如此荒谬的悲剧一件又一件在我们的周围上演。

各位，如果说“奥地利学派译丛”是在理论上呈现了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三任总统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Rostow）先生的《概念与交锋：市场经济60年》（王琛、邝艳湘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6月）就应该是在历史的层面呈现了自由经济蓬勃展开的发展历程。那些喜欢在象牙塔里品尝理论意味的人，可以借助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消磨时光，但喜欢历史细节的人们，则可以走进罗斯托的回忆里，去感受60年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1984年的秋天，罗斯托和他的朋友埃尔斯佩思在中国的乡村访问，一个明媚的早晨，他们被一名健康又快乐的妇女的背影深深吸引：这名黄皮肤的中国女人当时正站在一辆擦得光亮的丰田汽车旁边，盘算着如何在开放的市场里卖出更多的鸡蛋。



许多年后，罗斯托写作《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60年》，特意把他在这个早上的发现记录在书里。作为一名中国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1984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怀念那一年，经济和人性像春天的百草一样，争先恐后的萌生。我们对罗斯托的描述如此熟悉，记得那时我们的父母忙碌得像是一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深夜还在农田里耕耘，而大清早则又把农产品搬到市场里换取纸币。现在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学费，是日后我们这些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之所以能在城市里生存的精神砝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我们鼠目寸光，但来自美国的罗斯托先生帮助我们看得更远。在今天看来，至少罗斯托在当时看到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中国农村起步，是市场拯救了中国农民。

屈指一算，距离那个市场经济的启蒙时代，我们已经走过了23年。这些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罗斯托竟然有了一些先知的意味。他本就来自开放的市场，因此对一个新兴市场的起步与发展，便有了比较清晰的展望。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拥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明显特征，比如相当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大量外资和海外技术的流入，以及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要在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年的历程。但是，在罗斯托看来，真正唤醒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并且是效益最为明显的，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另一本同样来自美国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著作《2020年的中国》（*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Vikram Nehr, Aart Kraay, Xiaoqing Yu,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也认同罗斯托的观点：农民是农业和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触发了整个体制的改革，随着允许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的政策出台，共产党干部丧失了过去许多陈旧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层面的大解放！到1984年，99%的中国农民都开始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生产，他们生产得更多，也收入得更多，储蓄得更多。而在城市，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转移到了新兴的企业管理者手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农村制度改革的范式起步，成为农村制度改革的尾声。



在某种意义上，罗斯托的上述表述基本涵盖了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成就：这就是在总体上释放了中国人的力量，而在毛泽东时代，人的因素受到了巨大的压制。现在的问题是，正是过去混乱的现象，造成了今天中国人对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恐惧，这正是今日中国经济建设单方面突进，政府力量过于主导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基本原因。

先行者为师！罗斯托的视野显然比我们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要宽阔很多。比如他认为，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实施，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经济正好在这个时期调整到市场体系之上，因此受益匪浅。正如邓小平描绘的那样，上天给了中国人一份发展和赚钱的大礼。当然，这份大礼同样给与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也给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现在，我愿意借助罗斯托的市场化路径思考我们的命运。罗斯托曾经按照他的市场路径准确预言苏联体制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三代，现实正是如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罗斯托的预言得以证实。关于这一点，

罗斯托有详细的、别具一格的论述，他认为苏联解体，除了苏联经济急剧恶化、阿富汗局势遭到重创、另一个更为醒目的原因，竟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事业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道路。这个庞大的邻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一次加剧了苏联人的历史恐惧感。

当然，人类向往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才是这个世界朝着美好目标前进的主体力量。1965年，罗斯托先生首次驱车行走在通往汉城的机场公路上，他当时看到的是一排排飘着长长蒸汽烟雾的小工厂，这些小工厂正在把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木材加工成用于出口的新闻用纸。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罗斯托再次来到这里，过去的汉城，这座昔日破败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空气清新宜人，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大企业，人们都受过良好的国际高标准教育，城市里林立着一家家现代化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美丽的大学和饭店，条件良好的医院，完备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宗教信仰，宽容的国民心态，韩国成了这个世界上令人向往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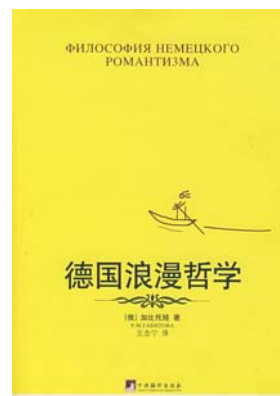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市场的引导。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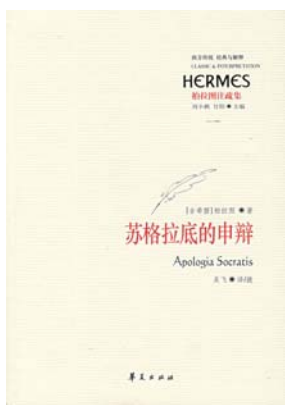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从8月开始，上海交响乐团每周五的室内音乐会推出了大提琴节，作为乐迷，自然无法错过。纵看整个曲目，由于前有巴赫音乐节已经把经典的大提琴无伴奏演奏完毕，所以这次的大提琴节上演的，大部分都属于浪漫派的作品，比如德沃夏克著名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变奏曲等经典浪漫派曲目。欣赏浪漫派的作品，总是与激情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情绪是阴郁、激愤还是愉悦，这与之前巴洛克时期强调和谐的音乐风格，显然已有很大的差异。

从音乐史上来讲，浪漫派承前启后，与之相对应的，在思想史上也有浪漫派的兴起，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发轫于德国的浪漫派运动，基本上主导了当时艺术、哲学、史学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要认识那一时期的时代精神，自然无法脱离对浪漫派的了解。关于这一段的精神史，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Hegel, 译林出版社, 2002年)的第一章中有相当精彩的描述，但是关于浪漫派哲学的系统介绍，则少之有少，最近推出的《德国浪漫哲学》(加比托娃著, 王念宁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5月)无疑可以暂时弥补这一缺憾，说可以弥补空白，是因为它确定以浪漫派哲学为主题，而且涵括了几位标志性的浪漫主义哲学家，比如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说是“暂时”，是因为笔者从这本书的前言后记中嗅到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气味，并非是因为“马克思”让我感觉可疑，而是“主义”似乎暗示了这本书的整个立论就朝着一个不大能经受得住哲学诘问的基础上。



青年浪漫派意图建立一种宇宙精神的诗学，在德国狂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社会集体的思想骚动，整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法国的萨特、加缪以及德国的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都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偶像。最近推出的《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Irrational Man, 威廉·巴雷特著, 段德智译, 上海译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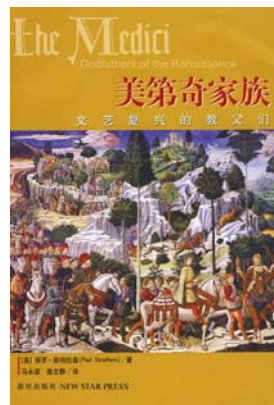


社, 2007年7月)倒是提供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存在主义思想地图, 该书在英美世界里也算是一本介绍存在主义的典范著作, 因此我们也自然可以安心阅读。不过对于笔者这种眼高手低的人而言, 对该书的很多说法其实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 比如将克尔凯戈尔等人硬拉进存在主义思想的谱系中, 对于知识体系而言自然必要, 但是这未免又将思想史的很多复杂性给抹掉。

说完西方现代思潮, 最后难免又得回到古希腊, 这里想推荐一深一浅两本关于古希腊思想的著作, 前者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著, 吴飞译疏, 华夏出版社, 2007年6月), 柏拉图的《申辩篇》的中文译本自然有好几种, 严群、水建馥、王太庆以及王晓朝的译本都各有千秋, 我并不敢确定吴飞的译文究竟比起前者有哪些长短处, 但是值得推荐的是译者吴飞写的一篇长达63页的引言, 将《申辩篇》在西方哲学界以及中文世界里的研究状况作了细致的梳理, 对于我们无疑是个相当方便的向导。

另一本则是相当浅易的古希腊哲学教材——《希腊哲学简史: 从荷马到奥古斯丁》(王晓朝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6月), 尽管作为教材, 该书的体例与文字仍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但是考虑到古希腊哲学的广博与复杂, 这本教材以如此篇幅能够将这么多哲学家罗列引介, 本身就是相当不易的工作。如果对古希腊思想有兴趣的读者, 自然可以通过此书按图索骥, 获得一个大致古希腊思想地图, 这样的读物无论如何,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哲学对于很多人而言, 自然是枯燥无味, 而历史著作只要写的饶有趣味, 自然是不论读者年龄、学历, 皆可取一瓢饮。最近一本《美第奇家族: 文艺复兴的教父们》(保罗·斯特拉森著, 马永波、聂文静译, 新星出版社, 2007年6月)倒是值得一读, 笔者关心此书是因为马基雅维利, 谁都知道, 当年这位“权力阴谋论者”所写的《君主论》就是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成员, 如果了解到那段复杂的权力斗争史, 或许应该对《君主论》背后的真实意旨, 有了更加精确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 也与美第奇家族有关, 这也让笔者确信, 推荐此书应该会有不少的潜在读者群。



就如当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最终腐化一样, 按照美国大左派沃勒斯坦的看法, 美国今天也在走向衰落。至于原因, 那么就请阅读这本《美国实力的衰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谭荣根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7月)。大致来说, 沃勒斯坦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源性矛盾, 而今天弥漫在世界各国的, 都是反对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 这已经预示了美国霸权已经在走下坡路。这一论断对于很多国人而言, 自然是欢欣鼓舞, 不过我们似乎并看不到“反体系”运动在我们的周围, 到底有什么动静, 沃勒斯坦或许应该要了解, 对于世界政治而言, 其实是“远近高低各不同”。

最近, 一部由旅日独立制片人李缨导演的《靖国神社》据闻将要公映, 但在之前, 国内舆论已经对此有相当的关注, 毕竟如何以中国人的近距离眼光理解这样一个神社, 这是从来未有的。而在日本, 同样也有各式各样的观察靖国神社的角度, 高桥哲哉的这本《靖国问题》(高桥哲哉著, 黄冬兰译, 孙江校, 三联书店, 2007年8月)自从2005年4月在日本出版后, 印数高达三十万册, 似乎可以代表日本公众的一种典型的想法, 也就是从日本人的情感、历史认识、宗教、文化以及国家政教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对靖国神社非常复杂纠缠的态度, 这些态度背后的政治立场虽然有必要紧守一些原则底线, 但是前提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一个敏感的政治符号, 对于彼此到底都有么样的含义,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的进行对话与交流。



以音乐主题开始行文, 也想以音乐书籍作为结语。虽然笔者也费心搜罗一些音乐家的传记, 但往往百密一疏, 错过不少值得推荐的好书。下面要推荐的书, 就是这样的漏网之鱼。加拿大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古尔德在中国也拥有不少的“粉丝”, 而这本《格伦古尔德的生活与艺术》(奥托弗里德里克著, 魏柯铃、刘莉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年5月)在我看来, 是少有将古尔德的音乐演奏与精神世界剖析的相当透彻的传记, 这当然要归功于作者身为《时代周刊》专栏作家的精道文笔, 也要注意, 他为了这样一本传记, 不仅在音乐方面, 同样也在古尔德众多琐碎资料中所度过的漫漫时日。一本好书, 从来都需要的是时间与精力, 而这却是许多读者往往不大容易注意的部分。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少年时代,听说严禁阅读黄色书籍,战战兢兢,因为家中有不少书是黄色封面。后来才知道此黄非彼黄,对我所在的那种文化一穷二白的地方而言,这种禁令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连鲁迅都见不到,哪里能看得到黄色书籍。现在想想,落后得连黄色书籍都没有,人们的精神生活真够贫瘠的。这种无的放矢的禁令导致一个后遗症,后来看到很多作家深情回忆当年如何如何受到“黄皮书”的影响,总是误读为黄色书籍启蒙了一代文学青年。

不管怎么说,“黄皮书”和“灰皮书”已经成为传说,它们就是侠客们掉下悬崖之后无意发现的武林秘笈。但是,接触这些“内部书”光靠掉下悬崖是没有用的,主要还是看级别,副部级或副军级,或者是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在一个几乎见不到黄色书籍的年代,“黄皮书”是怎样一种稀缺资源,可想而知。我一直对“黄皮书”和“灰皮书”的书目很感兴趣,可是遍寻不得。王晓先生的《有关“黄皮书”的不完全报告》部分满足了我的这个愿望,作者走访了不少文化界人士,还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库里搜寻了一番,最终整理出一份比较详尽的目录。“黄皮书”的印数,最初是900册左右,基本上相当于限量编号发行。我在这个夏天刚刚在一位师长那里见过它的真身,三四十年前,就有一小撮文学青年传阅这些秘笈,他们想不成为作家都难。一些人连黄色书籍都看不到,一些人却在传阅“黄皮书”,文化差异就是这样产生的——政治基础而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这里,要特别表彰一下刊登王晓文章的《读库 0703》(新星出版社,2007年7月)。张立宪先生几乎凭一己之力,主编这份连续出版物,暂且不说内容版式,连邮寄时的打包都是兢兢业业。他写文章时一向以“不严肃”为特色,做起事情又是认真之至,他在博客上为徐晓先生的《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所作的校勘,可以用精细来形容。中小学的校训常是严肃、认真,我更喜欢这种不严肃、认真的风格。从《读库》也能看出,一旦出版开放搞活,将有多少人可以大展身手。如果说《读库》有什么缺点,就是有些文章火候失调,不严肃得近于油滑,正如本文的风格,多看让人生厌。

接下来,严肃点,谈点历史。杨天石先生的《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晚清史事》、《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国民国》(以上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以“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为题同时出版。杨天石以研究蒋介石而著称,张秀章先生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之后,他撰写长文批评这是“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2007年1月26日《文汇报读书周报》),标题有些夸张,内容却实实在在,一一列举其中出入。其中是非,外人不便评判,但是我基本不买“编著”和“编译”的书籍,这个做法看来大体没错。杨天石还曾担任《百年潮》主编,这份杂志一度与《炎黄春秋》齐名,可惜如今物是人非,花开两朵,只剩下《炎黄春秋》一枝独立。



苏珊·桑塔格的论著我见一本买一本,比如新出的《激进意志的样式》(何宁、周丽华、王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这套书的封底印着三行字“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这段话的出处不详,但我始终以为它和桑塔格的精神是相悖的。我很难想象桑塔格会说出或者认同这种“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说法,“真理在握”的句式应该正是她所远离的,如果这确实是桑塔格所说,肯定也是一时失口。

由台湾学者主持翻译的“韦伯作品集”,我也是见一本买一本,这次又推出第十一本《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十二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质量如何可靠不敢保证,但至少要比林荣远先生翻译的《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略胜一筹吧。林荣

远和姜志辉，这两位译者都是勤奋至极、产量惊人，同时又视野开阔、无书不译，我的阅读跟不上他们的翻译速度，所以见一本就放弃一本。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4月）薄薄一册18元，我正犹豫是否购买，一看译者姜志辉先生，如释重负，赶快放下。当然，像我这种“以人废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诸位读者不要效仿。

8月，新星出版社推出“奥地利学派译丛”，包括[奥]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刘亚平译）、[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译）、[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美]穆雷·罗斯巴德《权力与市场》。其中有些超出我的阅读能力，所以我先选了《官僚体制 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学”为一些“进步”作家描绘了生动的写真，如果那些自称“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教授们看到这些章节，肯定会摹仿鲁迅露出鄙夷的表情。译者之一冯克利先生，不用多作介绍；译者之二姚中秋，即秋风，也不用多作介绍。

日本学者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让我想起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对传统手艺人的访谈》（英珂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再造魅力故乡》讲述了日本17个小城镇的社区营造故事，《留住手艺》则是对14位手艺人的采访。在翻天覆地的今天，china已经被音译为“拆那”、“拆啦”、“拆了”、“拆啊”，万变不离“拆”字，一些保护文物都无法幸免。台湾学者夏铸九先生，在序里为《再造魅力故乡》破题，他指出：“经由本书，希望有志于中国大陆的小区规划与设计，以及小区维权的朋友们，能够更进一步地‘结合’中国大陆的具体特殊情境，推动改造中国大陆的城市与聚落，让它们慢慢能成为有魅力的地方。”可是，仔细阅读此书，就会发现其中不少举措，碰到中国特色都会失效。即使如此，也不妨碍《再造魅力故乡》作为一种愿景，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中。



当我一一翻阅上述书籍，意外地发现竟然三种都与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有关。“韦伯作品集”和《再造魅力故乡》的译文由它授权在大陆使用，《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虽然是重译，它最初的中文译本也是由它在1991年出版，译者是《自由中国》的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先生。远流出版事业公司的活跃，或许跟出版的开放搞活有关。诸位如果对它感兴趣，可以登陆远流博识网：<http://www.ylib.com/>。

专题：社会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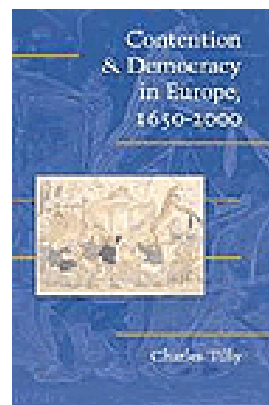
编者按：社会运动研究近年开始被国内引介，其中包括有蒂利、塔罗、赵鼎新等人的著作，本期刊发两篇关于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专家蒂利(Charles Tilly)的书评，意在通过这一研究方向来观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某些问题，也显示我们借助书本来理解社会的阅读方向。

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国、英国民主道路的解读

书评人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 qiangwu.de@googlemail.com）

随着国内学界对欧美6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趣和中国当下维权运动的关注，美国著名社运研究学者查尔斯·蒂利的名字也逐渐被大陆学界所熟悉。2006年底、2007年初，蒂利的两本著作——《威慑、资本、和欧洲国家》和《集体暴力的政治》——在中国大陆连续推出中文版。今年夏天，他还将到访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个社运研讨班上亲自为中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者授课。

因为社会运动总是伴随着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过程，社运研究往往看上去像社运史研究；相对于通常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等等视角，用社会运动这一社会政治来理解政治过程往往又会



得出一些非同寻常的结论。虽说社运研究对中国出版界来说还相当陌生，新近引进的这两本书并未直接论及社运，但是蒂利独特的社会政治视角，已经为中国读者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作为北美社会运动研究的干将，蒂利著作等身、相当高产。他在 2004 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欧洲的抗争和民主，1650-2000》(英文版)，从社运史的角度重新诠释欧洲民主化历史，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笔者一代，经历过 80 年代的学生运动，在阅读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人，1991) 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1994) 的反思过程中，大多认同了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但是，蒂利对法、英两国道路的重新解释，展现了介于暴力革命和议会政治之外的第三个空间——抗争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对民主化的推动。这是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化进程的丰富性，也有助于我们从当下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中汲取信心。

蒂利对法、英道路的重新解释，是在学界新近对民主化研究的反思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在非民主和民主政治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们不应当把民主化简单理解为从非民主向民主体制的变迁，比如一个民主存量递增的长期过程。相反，如民主理论大师达尔所说，在过去和现在，在任何国家，相对民主而言，“去民主化”的趋势始终广泛存在着。相对于主流体制政治，蒂利长期研究的抗争政治也就是与“去民主化势力”的斗争因此对民主化贡献巨大，欧洲过去两百年的民主进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抗争政治的历史。

按照蒂利的解释，尽管非抗争政治——比如布坎南和杜洛克强调的财政、税收与民主的关联、政治参与与政治公开、利益表达与政治组织活动等等——仍然构成政治活动的主体，但是民主化却主要发生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就是公民与代理人之间的三个互动部门：公共政治、类别不平等、和信任网络。这三个部门同时也是抗争政治的三个战场，促进着民主化。民主化因此可被概括为公民与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威权之间的关系变化、抗争政治的结果，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公共政治制度化的维度，需要以社会不平等的消除程度和今天以社会资本来称呼的信任网络来衡量。这一视角既适用于审视现实民主社会的民主现状，比如 9.11 之后美国民主的退步或者东欧后共国家不同的民主进程，也适用于重新看待法国和英国民主道路的差异和意义。

以法国大革命为例，由于高毅和朱学勤的著作影响甚广，许多中国读者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最后引致拿破仑的篡权和卢梭式人民民主理想的覆灭，20 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也重复着这一道路；同时，英国的光荣革命却奠定了宪政主义的基础，自由民主在随后的两百年里不断得到巩固。这一观点也是今日宪政主义思潮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一，并支撑着若干渐进改革的思路。但是，在蒂利看来，法、英道路的差异似乎并非如我们想像中如此截然；相反，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抗争政治的方式和作用，对民主的发展和巩固而言，倒更具意义。

具体说来，法国大革命不仅奠定了欧洲近两百年人权与共和制的民主基础，而且“激活了一系列民主促进机制”：抛弃路易王朝时代以贵族、包税人为中介的间接统治，建立集中行政管理体制（包括欧洲大陆第一个警察国家体制）和大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建立选举和代议制，废除贵族—代理人网络（包括旧的妨碍民主的信任网络），代之以跨阶级联盟和各种公民协会。这一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统治的民主模式成为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民主化框架，拿破仑政府继续巩固了这一体制，即使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1851 年发动政变，也不敢废除 1848 年实现的普选权。在《抗争的法国》(1986) 这本蒂利自己早先著作的基础上，蒂利把法国抗争政治的模式归纳为与“法国军事扩张——国家扩张——直接统治”一条近代民族国家主义线索平行的另一条线：“人民抵抗——斗争——协商——公民权”。公民抗争和 19 世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与威权政府的斗争、外敌入侵的动态过程中，推进着民主。1830、1848、1870-71、1905-07、1935-37、1944-47、1968 等历次抗争和革命因为各种社会不平等而产生，而以不断扩大公民权和有组织的协商结束，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法国民主。

英国道路也不例外。只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权利法案赋予议会更大权力之后，英国的社会不平等更多地体现在宗教不平等，英国的抗争政治因此集中体现为宗教解放的斗争，也就是围绕天主教徒争取宗教平等展开的抗争。这一抗争在 1825-26 促成了同情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新教代表进入爱尔兰议会，1918 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赢得爱尔兰议会选举胜利并退出英国议会、翌年展开武装独立斗争。虽然两年后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但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抗争并未结束，在 1968 年的波及世界的抗争风暴中再次爆发，持续至今。另一方面，传统的民主化观点偏重于英国的改革道路，比如 1832 年通过的第一部改革法案、以及 1867、1884、1918 一系列改革、二战后英国福利体制的建立等等，但是，蒂利却指出：尽管 1832 年改革法案扩大了资产阶级在英国议会内的席位，实际上却广泛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去民主化”的保守力量在 19 世纪的英国宪政体制内仍然相当强大，为推动法案作出努力的英国工人最后发现他们的权益被排除在立法之外。这一结果大大刺激了英国工人阶级在 1838-48 期间大规模动员。他们以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等多种方式，提出了广泛

的政治要求，包括男性普选权、每年召开议会、投票选举、废除对议员的最低财产要求、议员工资、平均选区等。英国抗争政治的主轴也由此从宗教转为阶级，这些今天被当作自由民主的当然内容和形式却是由体现人民民主的工人阶级的抗争政治争取而来。

在著作的最后，蒂利将这一抗争与民主的关系推及俄罗斯、东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巴尔干国家、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之间的反复中，抗争以及抗争的因果机制——也就是笔者在自己的社运研究中强调的认知、关系和规范构成的三重社会政治边界机制——再生产着公共政治、社会不平等和信任网络，改变着威权与民主。正是在这意义上，如果有人把当下中国的维权运动视作民主化的开端，大概一点也不令人惊奇。

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政治是战争的延续！”

——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书评人 羽良（北京 priestliu@gmail.com）



随着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相继爆发“颜色革命”，以及国内近年来民间维权运动的兴起，国人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已经逐渐走出学界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作为美国社会学界研究社会运动理论的干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也随着他诸多著作被译介而为国内学界所熟悉。

作为国家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史理论方面的权威，蒂利自 1974 年出版第一本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开始，至今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理论专著，堪称著作等身。新近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英文版出版于 1990 年，下称）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法国大革命与渐进改良

蒂利通过追溯欧洲最近 1000 年的国家形式历史的考察，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国家理论：由于（欧洲）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相互战争的威胁，基于各国地理分布上的偶然，各国统治者为准战争对内榨取税金、贡赋采取的不同策略，产生了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化强制型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成路径。

师承政治社会学大师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蒂利的政治社会史深受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影响。蒂利认为，以往的国家形成理论总是难以摆脱目的论的谬误，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有追求某个明确的目的而有意识的设计出国家发展的路径。每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都是国内外冲突压力下的产物。就欧洲国家来说，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分裂为数百个大小公国、主教辖区以及城邦国家，在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寻求控制更广阔的土地和人口时，国家之间产生了持续不断的试图吞并对方领土的战争威胁。在战争的外部威胁下，出于准备战争和战争后管理占领区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通过设立法庭、财政税收等官僚组织和警察、军队等军事组织垄断国家暴力，一方面利用官僚组织进行更为有效的社会管理和财政榨取以支持战争准备过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建设军队组织来对国内反抗者和外国进行强制（Coercion）。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对统治者榨取资源能力的要求也在相应的提高。这迫使欧洲国家发生内外两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对内统治的方式由“中央君主—地方代理人”的间接统治逐渐向中央政府的官僚科层体系深入到地方基层的直接统治转变；对外威慑力量由私人武装向大规模雇佣军武装直至建立职业的常备军队武装转变。而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欧洲各国最终走向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式。蒂利对国家形成路径的这种解读，从根本上逆转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

著名命题：“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才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释欧洲国家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这一点上，蒂利的社会史观提供了一种解读“革命与渐进”孰是孰非的崭新视角。以法国大革命为例，今日知识界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反思后，已经普遍接受了“告别革命”的经验主义态度。因而，在对卢梭暴力激进民主理论的反思中，对大革命血腥历史残酷的反感中，更是在对革命理想主义进行经验主义的批判中，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政治乌托邦”和“道德理想国”的代名词。但在蒂利的解读中，法国大革命有着另一番意义。路易十六为支持美国独立战争欠下了 5.3 亿里弗的债务令法国国家财政几近崩溃，为此不得不在 1789 年召开中止了 175 年之久的三级议会。但此时的法国尽管专制，但在国家统治模式上，仍旧沿用通过地方贵族和牧师作为行政代理人的间接统治方式。自路易十四时代起中央政府对地方封建权贵一再的授予特权和免税收买，造成了以贵族和神职人员为主的地方特权统治者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难以弥合的对立。间接统治造成的社会分裂，完全反映在路易十六被迫召开的三级议会中。议会中封建的地方特权阶级选择与国王联盟，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对抗。随着三级议会必然的破产和军队叛变，革命的对立派开始逐步获得对国家机构的部分控制权力。随着革命的深入，社会秩序的混乱不可避免，革命者试图通过革命初期各地出现的委员会和民兵组织执行中央意图进行地方统治，但最终发现对地方委员会和民兵难以进行控制。通过派出中央特派员，结合地方委员会和民兵组织，以及按照地方划分选举出官员和代表等手段，巴黎的革命者在不经意间完成了法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变，并推进了国家权力的扩张。

不可否认，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最终变了味道的革命理想主义毫不值得赞扬。蒂利作为结构主义社会学家更不会像某些极左的政治哲学家那样，基于哲学的思考而不顾史实的在道德上对大革命的意义给予褒奖。但蒂利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重新考察，在实证的意义上下出了重要的结论，找到了革命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暗示了，革命爆发前后，社会自下而上的体制外抗议政治对于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

考虑到国内知识界普遍有的文革和八十年代的社会记忆，对法国大革命做出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完全是一种思考上的自觉，这一点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但就此认为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可以在体制内以“递增”的温和方式完成，从而将带有费边主义的“渐进改良”理解为对体制的劝谏和体制内的主动改革，并否定任何体制外带有激进色彩的抗议政治手段，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合成谬误，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病。

可以说，蒂利对欧洲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以及他在其它著作中基于社会史视角对欧洲各国民主化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国家民主化进程中“革命”与“渐进改良”之间真正的区别。与极端的暴力政治表现“革命”相对，“渐进改良”并非顺从政治或劝谏政治的代名词。相反，与“革命”相同，真正的“渐进改良”所针对的，都是掌权者无可避免的“去民主化社会”倾向，因此，都更多的依赖体制外的运动来抵抗这种“去民主化”。二者所不同的是，革命是在抵抗中演变成一种不计社会成本的暴力政治。而真正的渐进改良，一方面认同各种体制外社会运动等抗议政治手段成为争取社会民主化的核心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涵盖了体制内为回应抗议政治的各类议题所主动做出的改变。在体制外抗议政治与体制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中，才会有真正的“渐进”和“改良”。此外，“革命”作为一种极端类型的体制外抗议政治，更多的应该成为政治思考的一个“参照”，而非单纯否定。



战争准备、军人政权与国家强制的拉美化

蒂利在最后一章分析了二战后广泛存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人政权现象。在蒂利看来，“政治是战争的延续”的意义在于，政府为准备对外战争而对内进行资源榨取的过程中，出于社会管理和资源榨取效率的考虑，而逐步从较为简单的政府功能逐步扩大为较为丰富的行政体系。这其中，又伴随着政府与社会各主要阶层在资源榨取上权利义务的讨价还价。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扩大了文官政府系统在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权重，相应的削弱了军队组织在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与被榨取者的讨价还价中，资本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议会的最终出现，也削弱了军队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权重。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军队首先是作为对外威慑力量出现的，作为垄断国内暴力的对内强制工具，只是军队组织的副产品。这一点，从在军队组织出现以后很久才分离出专门对内的警察组织这一点上可以得到证明。蒂利将这样一个过程称之为“政府平民化”，军队组织对政治的影响力，在军队自身的专业化、文官体系扩权、资产阶级议会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力

量上升的过程中逐渐下降，最终成为远离篡取政治权力的一支力量。

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继承了殖民地时期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完整的行政体系。但殖民地时期各国并未培育出真正的代议制民主和有利的市民阶层，军队组织建立的初衷即有强烈的对内强制的意图。同时，军事力量对其它政治力量的优势还体现在外力的培植和援助上，二战之前，拉美地区成为欧洲强国的后院，而众多拉美国家的军人更是多在欧洲受训。二战之后，由于苏联军事势力渗透到拉美，将拉美视为自己后院的美国，乐于支持拉美各国军事组织的发展，并予以巨额援助，因此促成了军队组织相对于其它政治力量的绝对强势。政府的平民化过程在不依赖国内资源榨取的强大军队组织勉强，显得软弱无力。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拉美地区受冷战影响逐渐下降，加之美国国内的人权批评压力，美国在拉美地区开始减少了对军队组织的援助，并默认民选政府上台，逐步推行削弱军队力量的平民化过程。

但为什么拉美地区至今仍存在军人政权？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军人政权获取供军队组织所需资源的方式，除了外援，还有军人寡头政治特有的“军商复合体”方式。比如委内瑞拉现任总统查韦斯，作为军人出身的政权领袖，查韦斯同时还是委内瑞拉国有石油集团的总裁。利用强制手段对经济资源进行垄断，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摆脱对外援的以来，另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更为肆无忌惮的绕开为资源榨取而不得不与资本和市民社会力量展开的讨价还价。同时，集强制、资本的力量于一身，国家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也将系于军事强人一人之手。最后强制的集中总会压过资本的集中，令国家走上强制集中的“强国弱民”道路。

这种资本被国家垄断，国家却偏向于强制集中的“强国弱民”道路，绝不仅仅存在于军人政权这种极端、明了的政体结构中。在政府“去民主化”力量强大的国家，国有经济的过分强势，同样可能造成类似的情况。这一点，将是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

选举威权主义背后的强制与资本

随着冷战结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越来越多处于独裁或政治寡头之下的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开始通过披上投票选举的外衣来给自己镀上一层“民主化”的金。

然而，民主政治绝非“投票”那么简单。美国学者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等人研究发现，经历了第三波浪潮的国家里，只有不到半数国家达成了较高质量的民主政治水平，而其它国家则大多陷入了“选举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的泥潭。

何谓“选举威权主义”？根据谢德勒的研究，公民可以基于自由民主的原则，无阻碍的进行政治权威的社会选择，即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而在7个关键点上与真正的民主选举规则不符的政治选举行为，便可以称之为“选举威权”。笔者碍于无法浏览相关文献数据库，此处转摘台湾学者黎家维编译的谢德勒论文中关于选举威权的特征列表：

选择的面向 民主选择的规范前提 打破规则的策略

1 选择的对象 **Empowerment**: 民主选举涉及委任决策权威 **Reserved position**: 限制可选官职的范围

Reserved domains: 限制可选官职，其所管辖之范围

2 选择的范围 **Free supply**: 公民必须能自由组成、参加和支持各种类政党、候选人与政策。 **Exclusion of opposition forces**: 限制反对者进入选举的场域

Fragmentation of opposition forces: 扰乱分化选举反对阵营

3 偏好的形成 **Free demand**: 公民必须能够透过各种信息来源来了解可能的选择 **Repression**: 限制政治和公民自由

Unfairness: 限制运用媒体与资金的管道

4 选择的代表 **Inclusion**: 政治全体所以成员有公平参与的权力 **Formal disenfranchisement**: 合法投票权的限制（资格）

Informal disenfranchisement: 实际上投票权的限制（篡改选举名册）

5 偏好的表达 **Insulation**: 公民必须能自由表达其选举的偏好 **Coercion**: 威胁选民

Corruption: 买票

6 偏好的集合 **Integrity**: 一人一票。民主的平等概念，是票票等值。 **Electoral fraud**: 再分配的选举操作（做票）

Institutional bias:再分配的选举规则（绝对多数制、选区划分）

7 选择的影响 Irreversibility:选举结果若无影响，则不能称为民主。 **Tutelage:**阻止民选官员行使宪法权力

Reversal:防止选民取得官职，或防止民选官员终结执政者的宪法任期

（来源：Andreas Schedler,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2, April 2002, p.39）

按照谢德勒的标准，不少刚刚经历民主选型的政体，都还或多或少处于“选举威权”的状态下。无论是被不少大陆人士视为转型样板的台湾，颜色革命的典范乌克兰，还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和李光耀的新加坡，在分类上均属“选举威权”政体。

之所以提到上述这些“选举威权”方面的研究，是因为蒂利构建的“强制与资本”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选举威权”的存在提供可能的解释。任何可以实施“选举威权”的政体，必然具备的特征是拥有足以持久影响、改变选举规则的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与最终令国家走上强制密集型的古代欧洲国家统治者不同，当代威权统治者在加强强制方面的做法更为现代化。

当代威权统治者无法像西班牙国王那样，通过殖民地的利益输入来进行国内收买，也不可能像有的东欧国家那样，通过武士和贵族阶层的间接统治加强强制。20世纪后半叶的威权统治者偏向于更直接控制经济资源来保持其强制的水平，以此来抵消政府平民化的过程和选举政治给反对派带来的潜在机会，从而为“选举威权”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有越来越多的非民主国家青睐国有企业或准国有企业（如台湾的国民党党产问题），相对于严苛的税收，国有企业是更为有效的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因产权不明产生的效率低下，可以看作是威权政治统治的“成本”。扩大就业、保证要素资源掌握在政府当局手中、维持收入再分配格局、扶植本国弱势产业成长，国有企业所起到的这几个作用，帮助威权统治者，尤其是贝隆式的民粹威权统治者保持强制所必须的维持表面经济平等。

通过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强制集中程度，挨过了民主化浪潮的威权统治者们得以游刃有余的操纵选举，在披着国有经济外衣下的军工复合体的保驾护航下，大行选举威权之道。蒂利为我们提供的欧洲国家形成理论，为理解“选举威权”国家乃至更广泛的各色威权政体向真正民主政治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书评

中国打工妹：失语者的呼声

书评人 严飞（香港，fei.yan@green.oxon.org）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廉价的劳动力，吸引着各国商家不远万里来此设厂。全球资本的涌入，让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显著提高的城市生活水平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以及对外来劳动力的剥削，却总是被轻视或者弱化：在“世界工厂”、“中国价格”美誉的背后，是无数在高温机房里熬夜加班，在伤人于无形的空气与化学品中茫然赶工的中国女工。

为了深入了解全球化对内地女工的影响，并真实记录她们的工作情态和内心体验，这本书的作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潘毅副教授，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间，亲自以一名“打工者”的身份前往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调查。在这半年多的打工生活中，作者与女工们同住、同吃、同睡，同上生产线日复一日地熬夜加班，因此对她们的梦想和希望、辛酸和苦痛有着非比常人的深刻体会，也因此能尖锐地刻画出她们所承受的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改革开

放之后的新兴资本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父权制度。

在作者的中国女工研究中，移民城市深圳一直是她的考察重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座经济开发区，深圳的腾飞处处留下了外来打工者的痕迹。在 1979 特区刚刚成立的时候，深圳不过是一个拥有 310,000 人口的小镇，劳动人口不超过 30,000 人。到 2006 年底，其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分别达到了 1200 万人和 960 万人。在这 960 万的劳动人口中，又有超过七成的外来工为女性，而在那些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工厂里，女性外来劳动人口的比例甚至达到九成之多。以作者深入考察的“流星电子厂”为例，该厂的工人总数超过 500 人，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其中女性工人约占到 75%。所有工人的平均年龄虽然超过 20 岁，但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女工年龄较小，平均只有 16 至 18 岁。

这些中国女工，她们另外一个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打工妹，则来自于广东话的方言。“打工”两个字本身，已经诠释了她们从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并且决定了她们的劳动身份：她们不再是毛泽东时代拥有高度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从事农村家务劳动的“农民阶级”。“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保护，它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是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无法享受到诸如住房、医保、教育等城市常住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她们打工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老板创造财富，为城市的兴旺添砖加瓦。

绝大部分打工妹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她们将会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每个月赚 500-600 元钱。她们知道工厂的老板不会仁慈，不会把她们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她们知道工厂和农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她们知道将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她们几乎什么都知道。

然而，她们进入工厂打工的欲望又是如此强烈。按照作者的分析，她们这种强烈的打工欲望至少来自两种诱惑，就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另一面是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当把这些打工妹们的人生轨迹放置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之中的时候，以更加广阔的宏观视角去俯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描画出一条城乡差别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曲线，而曲线上的每一个拐点，都见证了无数打工妹逃离贫瘠的家乡农村，跑到城市改变生存状态的梦想追求。

而“妹”字则代表的是她们的性别身份：无论如何试图改变自己女性地位的主体，都最后不得不接受家人的催逼而返回农村嫁人。一般说来，大多数打工妹到了 25、26 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 16 岁到 25 岁的黄金岁月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她们的身体被累跨，思想被抽空，甚至被强迫服用避孕药以缩短生理周期，延长工作时间。而接下来的归宿，则必须遵循父权制文化传统的约束，回到农村结婚，生儿育女，为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

这些女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倍受歧视和剥削。她们的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正是她们在中国社会急剧重构的资本与文化的巨大压力下进行抗争的最真实形态。“面对社会张力及内在挣扎，她们根本没机会出声，唯有靠半夜尖叫、噩梦发泄；这段社会历史的背后，不知藏着多少创伤。”由此，作者把打工妹这个群体称为“失语者”。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她们是游离在社会中的弱势边缘人，她们的声音也因此注定无法曝露在社会主流话语之中，注定被轻易地忽略和覆盖。

《中国女工》使我们看到，这些新兴打工阶级固然失语，但是仍有呼声。虽然她们今天的呼声依旧弱小，少有人顾及，甚至给人以迟到的感觉，但迟到毕竟比没有好。她们开始表达和倾诉，她们在扩大的城乡差距之间，在加重的性别不平等之中产生了呼喊的欲望。这种欲望不可避免地会使她们碰到残酷的现实，但它也是一种抗争的动力，从前是抗争农村父权制度里的压抑与扭曲，现在是抗争都市资本制度里的压迫与不公。作者在最后一章所特写的一位名叫阿英的女工的尖叫，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尖叫，是对资本暴力与社会荒谬所爆发出的谴责之声。

(标题名“失语者的呼声”，乃是作者由乐施会赞助出版的另一本关于打工妹研究的书名，该书记录了 16 位基层女工口述的打工故事，由三联书店 2006 年 3 月出版。)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明报出版社，2007 年 3 月。

“竞争”与“稳定”的悖论

书评人 张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



已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借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走红已经得到广泛介绍，然而他最出名的三本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中关于政治制度基本认识的内在张力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尤其是奥尔森对于“竞争”与“稳定”这对概念的理解。

在《集体的行动》中，奥尔森首先勾画了一个集团行动的难题：即便集体中的成员享有共同的集体目标，由于自私自立、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成员并不总是能够为共同的目标出力。因此，小集团往往更容易组织。《国家兴衰探源》则延续了这个逻辑：在一个稳定的政体下，代表少数人局部利益的利益集团会逐步利用小团体在组织上的优势，有效地“挟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工具。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控制小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个国家就可能陷入经济“滞胀”、“社会僵化”的局面——如该书副标题所暗示。

如何不断打破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稳固以防止经济僵化？主流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政治竞争上：政党、社团、各种利益集团。奥尔森虽然不是左派，却对于传统民主政体下政治竞争对于遏制小集团利益的有效性深表怀疑。在《国家兴衰探源》里，奥尔森更倾向于某种“体制外”的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比如革命或是战争。他书中的比较研究所希望显示的就是：二战后在诸多西方大国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德、日两国得以保持经济强劲增长正受益于二次世界大战对两国原有体系下利益集团的摧毁以及外来的占领军对于本地原有利益集团的监控。

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所发生的体制巨变对奥尔森对“竞争”与“稳定”关系的思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约束竞争所产生的混乱使得奥尔森把打破利益集团、政经体系“保鲜”的希望投向了另一种政治形态。在他的遗作《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继续展开了他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惯匪”理论（stationary bandit）。频繁竞争所带来的政治统治上的不稳定只会导致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短视：对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寇”（roving bandit）而言，“竭泽而渔”的“三光政策”很有可能就是上策。而即便是靠“打砸抢”起家的匪徒，只要保证其长期控制权的绝对稳定，其个人的经济利益就会和所控制地盘长期福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惯匪”会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自己控制疆域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加理性的长远安排。在这里，政治竞争恰恰是要被约束的，以换来稳坐“钓鱼台”的“惯匪”的“风物长宜放眼量”。也正因此他在这本书里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摧毁官僚利益集团的作用表示了赞赏。



对于自己三本著作中对“稳定”和“竞争”这组概念前后矛盾的论述，奥尔森本人没有提出调和的办法。一种可能的调和的方法就是区别两个层面上的“竞争”和“稳定”。奥尔森反对的是在国家基本政治架构层面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所带来的不稳定有可能导致竞争参与者的不安全感，行为上的短视可能由此而起。而他所希望促进的竞争是在既定政治游戏规则以内的政治较量，这样的竞争能够撼动既得利益集团，促使现存体系不至于为个别人物或是集团所劫持。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在奥尔森的世界里，一个政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在保证政治基本框架稳定的前提下（限制第一种竞争和相应的不稳定性）通过有效的体系内竞争打破利益结盟的稳定性（促进第二种竞争和相应的不稳定性）。

遗憾的是，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理想状态，奥尔森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他的著作始终没有真正解释现实中的“流寇”如何转变成“惯匪”，也无法解释世界上众多“惯匪”为何始终无法感觉到“稳定”——远的如斯大林，近的有查韦斯。或许奥尔森对此都有答案——毕竟《权力与繁荣》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只可惜现在除了反复阅读他留下的这些著作，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
《权力与繁荣》，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关于《叶隐闻书》和武士道

书评人 李冬君 (天津, lidongjun2006@yahoo.com.cn)

1、“叶隐”是什么意思



“叶隐”一词由来，缘于西行之诗，西行诗曰：“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

此说甚美，有一种日本文化特有的含蓄美。万绿丛中一点红，是中国说法，可那一点红，并不隐于叶下，而是绿叶配红花，气象甚大。但日本文化，却说武士如花，隐于叶下，当你为他的羞涩而感动时，他的狂气却突然爆发。

另一说法是，取自佐贺特产——叶隐柿，将武士比作隐于叶下的软柿子？这比喻有点土，有点俗，不过，倒很像隐于树叶下默默奉公的武士，只是有点儿土气有余，而狂气不足，软柿子式的武士，恐怕很难说是好武士。

日本文化“小”，所以，山本常朝归隐，自称隐于叶下，不像中国文化“大”，即使归隐，也是隐于林下。叶下与林下，气象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语吧！但不能因此而分高下，大的不一定就好，大而无当就不好，小的往往美好。

或曰，叶即武士，武士归隐，就是叶隐，刚好常朝归隐，便以“叶隐”为书名。但日本文化，多以花喻武士，少以叶喻者。以花喻主君，叶喻武士，为常朝特例？武士“万绿”，而主君就是“一点红”了。此亦聊备一说而已。

2、为什么要叫“闻书”

山本常朝 52 岁时，是 1710 年，已“叶隐” 10 年。这一年，来了一位名叫田代阵基的人，只有 33 岁。两人初会，各自吟了一首俳句，表达他们心中愿望。常朝俳号“古丸”，在俳句里，他以“洗尘的山樱”自喻，也就是隐于叶下的“叶隐”者了，从俳号看，常朝“信而好古”，一如孔子。阵基俳号“期醉”，很青春的俳号，可以看作是期货。

他在俳句里，将常朝比作是天上的白云，和目下之花，他说自己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可以同这片云、这朵花相伴了，表达了一种忍恋。常朝听了这首俳句，想必很感动，十年叶隐，那份孤独可想而知，忽有粉丝不期而至，他一感动，就打开了话匣子，话儿滔滔，如放水矣。

一个口若悬河，不停地说；一个不动如山，默默地听。常朝口述之后就去世了，阵基又花了 7 年时间成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常朝于“叶隐”时口述，阵基据当时之口述笔录，补充了一些口述以外由他本人提供的材料，所以叫做《叶隐闻书》。有人说，《叶隐闻书》在形式上像《论语》，所以又叫做“武士论语”。其实，“闻书”与“论语”是有差别的，可它们的差异，无人问及。

“闻书”是记录性的，“论语”是论纂性的；“闻书”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谈话内容具有私密性，“论语”是老师教导学生，内容具有普世性；“闻书”是个人笔录，忠实于口述者本人的思想，“论语”是集体编撰，志在代圣人立言；“闻书”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言论很自由，什么话都敢说，“论语”是学派性的，语气斩钉截铁，有一种决定论的风格，要代表真理；如此等等……

而且《叶隐闻书》，在日本从未享有过像《论语》那样的官方地位。天皇不提倡它，因为书中所言的武士道，几乎就与天皇无关；将军也不提倡它，因为它所说的武士道，要求武士忠于自己的主君，而不是忠于将军，而且它对将军治下的“上方风”（江户、大阪一带的武士风）极尽嘲讽之能事。

这本书，是为他自己的国家锅岛藩作的，属于“国学”。但它在锅岛藩的官方地位究竟如何？目前我们已不得而知。

不过，从《叶隐闻书》版本情况来看，几个系的版本，几乎都是从这一带流传出来的，大正年间，出过一个本子，书名就是《锅岛论语》。

也许《叶隐闻书》在锅岛藩享受过《武士论语》的待遇？

3、用武士道剔牙齿

创作了武士道经典的人，是怎样的人？在我们的概念里，他应该活得很精彩。但生在文治时代的武士，徒具身份而已。没有打过一次仗，算什么武士？常朝就如此。

他像公务员一样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一个在精神上要特立独行的人，却日复一日的平庸下去以至于死，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救自己。而武士道，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次惟有武士才能做的事，那就是，他居然曾为介错，每念此事，便激动不已。有人来信，在信里，夸了他的介错手艺，他无比珍惜，因为只有这一件事，证明他还算个武士。除此以外，武士只活在他的想象里。

也许在这样的想象里，他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神右卫门。神右卫门是一位真刀真枪的武士，70岁时生他。当时70岁，可是绝对高龄，即使在今天，70岁还能生子，这样的男人恐怕也不多吧。因此，他差一点就被父亲看作是盐贩子的儿子。

常朝长大以后，自己也曾怀疑过自己的来历。他说，70岁生子，“水气不足”，是“阴干的”。神右卫门有一习惯，对孩子，哪怕刚出生，也必定要来个耳畔祝语：“长成大刚者，才必有高用”。把他要说的话，吹进耳朵里。就这样，他在常朝的耳畔喋喋不休了十一年。一直听着这样的话长大，那话，也就入骨了。父亲的训斥常在耳边：“武士无食，也要剔牙。”

他这一生，虽不曾为了撑门面，饿着肚子，无食而剔牙齿，但他却因为成不了像他父亲那样的武士，而咬文嚼字，在武士道里剔牙齿。他说，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他想象着，每日里，将自己置之死地，真是挖空心思。各种各样的死因和死法，他一一琢磨，如剔牙齿。

可真正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死的武士，哪有功夫看透死？！

4、国学是个好东西

山本常朝青春期，曾向当时著名的儒者学习。他成长中，刚好碰上德川幕府提倡儒教文治主义。他本来是课文治主义的好苗子，可他却反文治主义。

你问他，为什么要反文治主义？他说，孔子也好，佛也罢，都与锅岛藩没有关系，抬举他们，会贬低了自己的武士，忘了祖先和历史。不要忘了，锅岛藩有自己的国学，他一开篇就说：作为我锅岛藩主的家臣，首先要掌握我藩之国学。

我藩之国学大旨，无非是我藩武家一门的来历，先祖苦劳奋斗累积起来的丰厚的智慧和慈悲之心以及由它们带来的长久繁荣的运兆。无论释迦、孔子，还是楠公、信玄公，他们谁都不是龙造寺·锅岛家的家臣，都不曾以家臣身份侍奉过我藩，怎能适合我藩武家风呢？

所谓国学，就是先祖之学，先祖以武士道开国，向先祖学习，就要了解历代藩主事迹，他们的事迹就是历史，历史是武士道的载体。他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只有自己的国学，才能适合本国的国情，不光锅岛藩应该如此，各国都应该如此——以国学治国。锅岛藩国学虽好，但也只是适合锅岛藩，他不想放之四海。以各藩独立的国学，来对抗统一的儒教文治主义，还是战国时代的遗产。

我们知道，在日本以倡导国学而著名者为本居宣长，可本居宣长却是山本常朝的后辈，他是否受了山本常朝的影响呢？有可能。但他的着眼点已不同，毕竟时代变了。常朝立足于藩国传统，而他已着眼于整个日本。

常朝以锅岛藩的历史为根本，建立了武士道国学，而宣长却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根底，确立了神道国学宗旨。这两种国学，一个基于藩国，一个趋于天皇，为明治时代的到来作了国学的准备。强调国学，就是反儒教，反孔子，以为孔子无用于国家，常朝可谓第一人，而宣长继之。反孔子，无须讲什么大道理，全凭着一股子狂气。常朝对后世的影响，不是思想，而是狂，每当历史转折时期，狂就冲出来，扭转乾坤。例如吉田松阴，他的思想受山鹿素行影响，可他还有狂。

山鹿素行也反儒教，可他只反朱子学，要回到孔孟。而吉田松阴在狱中，作《讲孟余话》，连孔孟一并反了。他讲解《孟子》开门见山，矛头直指孔子和孟子，说：孔、孟二人，离开自己的生国，去仕奉他国的国君，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承认君和父为一义，那么我们能以君非愚即昏，就离开生国往他乡求明君吗？这与那种以己父为愚顽，而离家出走，认邻家翁为父有什么不同吗？然后，他斩钉截铁的说：孔、孟，失此义无须再辩！这话几乎就是接着常朝往下说的，是被《叶隐》的狂气熏陶出来的。明治思想家也反孔子，但他们已不单是出于狂气，还出于学理。

但学理却是西方的，福泽渝吉指出，儒教缺乏独立心和数学。

5、为了死而死

除了受父亲的影响，常朝还受了两人的影响。一个是禅僧湛然，教他世事无常，捻出一“幻”字。还有儒者石田一鼎，

教他儒者之勇，高举一“刚”字。两个“刚”字，都进入了他的内心里，一个“刚”字，是被父亲吹入生命中的，那是武士之“刚”，而另一个“刚”字，就是儒者一鼎教的。一个武士之“刚”，一个儒者之“刚”，这两个“刚”字，主宰了他，它们看似一致，而实质不同，在他的内心里对峙，看谁压倒谁。

毕竟是父亲，除了精神上的影响，还有遗传起作用，使武士之刚，逐渐克服了儒者之刚，占了上风。他创立武士道，很注意二者的分别。武士之刚趋于美，乃行动美学；儒者之刚趋于理，行动服从伦理。趋于美为“叶隐流”武士道，趋于理为山鹿素行之儒教武士道。

从《叶隐闻书》，我们几乎看不到山鹿素行对常朝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通过一鼎的教诲。一鼎用儒学刚强精神陶冶常朝，其中就含有儒教武士道。

山本常朝武士道是狂人化的，山鹿素行武士道是儒生化的。儒生化的武士道，强调死的目的性，即天下大义，就象我们常说的，死，有轻于鸿毛，有重如泰山。因此，死之轻重，是需要掂量的。而常朝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死就是死，没有必要这样算计，算来算去，还是怕死。

怕死的武士道，是“上方风”武士道，把商人的算盘，放在了武士道里，嘴巴上说起来头头是道，骨子里还是怕死。常朝认为，死不需要有别的目的，死本身就是死的目的。真正的武士，应当为死而死，纯粹的死，绝对死。死，是彻底的生，应当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而非最终目的。

与《叶隐》同时，还有另一本书，是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

大道寺友山，向山鹿素行学习军学，且寄心于儒教，他说：

“一个优秀的武士，应该牢记，从正月元旦一早起，拿起筷子吃煮年糕饼时开始，到那一年尾的大年三十夜，每日每夜把死不间断地挂在心里，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日日思死，也就从所有的恶事和灾难中逃离。”

这样的思死，其实是逃避死，要从死里解脱出来，而非视死如归，真的去死。一个每天把死放在心上的人，而始终没有去面对真正的死，真的像做戏。

“等待了一整天的死又回来了，总是盯着不动。”这样的死，如白日梦。

所以，那每天如一日地思考死，就如常朝所言：每天早晨，你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考虑死还是不死，假想着彼时死，或此时死，死的盛姿等，而武士道本来就要切断这种对于生的执着心，所谓武士道，其实就是豁出命来本身。

决死而立，便把死恭送给对手了，这就是狂气，而非道理。

有了纯一的死，生才不会无望，总要为什么而死，死就不得其所了。

6、带着美去死

武士道真谛，就是看透死，于生死之际，首先求死。

这没有多少道理好讲，只是觉悟而已，追求死的意义，讨论死值与不值，是跟死做交易，用死来演出，这样的死，有如胸糞，令人作呕不已！

死也许远离了目标或者不值，但不可耻，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求死者来说，求死而生是无败，求死而死亦无败。求死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了！所以，看透了死，一生无败。

真正的武士道无言，“死”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跟“死”讲道理，那是在演戏，在做交易。“死”是一种精神，没有什么理性，求“死”就是非理性。

死，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姿态，来探望我们，谁也不知道。

常朝在《叶隐》卷六里，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快意无比：高木鉴房背叛龙造寺家，请求杵岛郡佐留志城主前田伊予守，藏在他的城内。据说，鉴房是举世无双的武士，闻声而动，拔太刀的神速技艺、格斗时的麻利手法，没人能学到。伊予守的家臣中，一个叫因果左卫门，一个叫不动左卫门，他们也是不逊于鉴房的豪杰，是难以对付的人。此二人昼夜不离鉴房左右，警卫他。隆信公要追讨鉴房，并拜托伊予守。

有一次，鉴房坐在边沿，让因果左卫门洗足。这时候的光景是：伊予守从后面跑过来，突然，鉴房的头就离开了脖子，滚落下来，虽然是瞬间发生的事儿，但不愧是鉴房，在自己的头未落地之前的一瞬间抽出肋差，杀向正前方，同时也砍落了他对面的因果左卫门的头，两个头同时落入面前的洗脚盆里。

突如其来，如电火行空，流星一闪，死如神，亦似禅。

战国武士世界，时有残酷命运在等待，平静地接受，不动如山。

堀江三右卫门，是一个从藩仓库里盗取金银走脱的罪犯，抓到以后，被课以极刑。先是将他身体中所有的毛，用火烧光，他不动。随后，剥下指甲，切断全部筋脉，他还是不动；又插锥子，他依然不动。最后，纵向割裂开后脊背，将煮热的酱油灌进去时，才把身体弄弯死了。

抛开罪行不谈，这从容受死的“不动”之美，令常朝赞叹不已。

人皆有死，可有几人，能死得如此从容，如此有尊严呢？在神的眼里，人之事，如落花一瞬，所有是非、善恶，都忽略不计，惟有美，被神关注。

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不在盛开时，而在花落时，有物哀美。樱花花期不长，落花之际，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而剖腹者，尤如落花，随风飘起，将死之美尽情展示：

源左卫门在小城藩，是个优秀男子，举凡艺能一事，不管做什么，从未不如别人，特别是赌博，在西目一带可称第一，因他违了藩规，被命切腹。当日，检使一出现，源左卫门向介错人瞪着眼睛说：“我要尽兴地切腹，尽情地去完成每一个动作，当我大叫一声‘砍头’时，你就砍。若是在我的叫声消失后砍了我的头，我就咒杀你七代。”介错人回答：“放心吧，就按你的想法来切你的头。”于是，源左卫门用木棉牢牢地缠住腹部，在上面划十字。

肠子溜出来的时候，脸色渐渐苍白，眼晕，拿出小镜子，看着自己的脸色，说：给我纸和砚。这时，介错大声说：“已经不好了吧。”赫然打开眼睛说：“不，不，还没有结束。”在接过的纸上写着：说我是胆小鬼的伯父被眼屎糊住眼睛了吧，看到我死的遗迹，应该认识我了。然后递给家臣，让他把遗笔给伯父看。又大声叫道：“那么，可以了。”就让介错砍了他的头。

这样的死者，或许经不起道德评价，却经受了美的考验。

中日文化在对待死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文化斤斤计较于对死者进行盖棺论定，而没有对死本身的审美，只有道德评价，没有美的评价。

7、有思想还要有狂气

武士道走向近代化，有一个关键人物——吉田松阴。

他的许多思想，是从山鹿素行那里来的，山鹿氏有两本书，对他影响至深，一本是《武教全书》，他自称，研究《武教全书》数十年，说：

“余承袭家学，从幼时就读山鹿先师的书，直到今日。”

“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学为业，以武士道为心要，以死为常心。”

松阴著《武教全书讲录》，一开始就说：如果希望懂道，就请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导，自古至今，该读的书有那么多，而我特别信任素行先生。我先师的教导，你看了这本《武教全书》，就都知道了。

松阴为什么要称素行为“先师”呢？原来他有一位祖先，曾经是素行的弟子，他接着自命为素行弟子，当然要称素行为“先师”了。

还有一本书，是《中朝事实》，要日本以“中国心”来立国。所谓“中朝”，并非指清朝中国，而是要日本以“中国”自居。

本书论皇统，由天先·中国·皇统·神器·神教·神治·神知·圣政·礼仪·赏罚·武德·祭祀·化功之十二章和作为附录的或疑十三条构成。其依据为《日本书纪》，书中言道：本朝正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中国，北据高山，南窥大海，山海之间，平原开阔，河海可用。

因此，中国漕运便利，往来如一家，没有互相敌对，制度文物发达，没有必要像支那那样设长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频繁，有几次还是夷狄入侵为王。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余年，期间，臣下起而弑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国，自开国以来以至于今日，天之神以来的皇统未曾变过，弑天皇之叛逆没有几次，被夷狄入侵之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显然是自诩，有意美化历史，自从有了幕府，许多天皇的命运，就如同曹操治下的汉献帝，实在是可怜兮兮，素行所言，乃大而化之。

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精神，是日本立国的精神，为了表达某种精神，日本人往往会忘记历史，把历史当一团泥，用思想捏来捏去。

素行那一吼，使日本人猛醒，清朝是夷狄，中国在此！如老和尚当头棒喝，喝掉了江户朱子学的魂——朱子学是夷狄之学，回到孔孟去！道理很简单，不用多说，因为清朝信奉朱子学，而满人是夷狄。视满人为夷狄，这样的“中国心”，不光日本，当时的朝鲜和越南，亦如此。

素行叛逆了朱子学，是日本思想走出“唐化”的开始。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唐化——大化改新；一次是欧化——明治维新。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而素行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历史转折期，日本向何处去？素行的“中国心”，还以孔孟为根本，素行尊王攘夷，还是个天下观里的格局，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把日本放在中心了，思想还在中世纪。至吉田松阴，时代变了，欧化来临，天下观不适应了，孔子也出了问题，他必须冲出素行思想范畴的樊篱，其动力，不靠思想，靠狂气。

用狂气打倒孔子，这就要直奔常朝而去，不管他自觉，还是无意。如果说，素行的“中国心”还是根据《日本书纪》，那么，他就要更深入一步，到《古事记》去。《古事记》没有思想，都是神话，充满了原始的狂气。

《叶隐闻书》中颇有超是非，超善恶，超生死的言论，其根柢亦在《古事记》，打倒孔子，他可以从《叶隐闻书》汲取狂气，可面对欧化，他必须回到《古事记》，从神话里，汲取神的狂气，为天皇万世一系，建立信念和依据。

针对他所说的“此大八洲，乃天日所开之所”，日本朱子学者山县太华即刻予以反诘：所谓天日，又称太阳，普照世界万国，岂能作我一国之祖宗？反诘如此有力，可他对皇国之道基于神话，依然寸步不移。这就是松阴，敢于坚持非理性，但他并不缺乏理性的精神。

他手不释卷，大声朗读：“兴起拿破仑，倡导自由……”。

向历史的纵深处，奋不顾身的一跃，一头扎进神话，如芭蕉俳句名言：古池，死一样的寂，蛙儿飞矣！向着死亡飞去，新时代因死狂而开启。

开辟时代的拓荒者，其本能中便含有伟大的狂气，而《叶隐》之道，即修炼狂气，造就伟大的狂者。

8、日本文明的狂气

读了《古事记》就知道，武士之狂源于神狂。《叶隐闻书》里的死狂，已经让我们触目惊心了。

可是同《古事记》的神狂比起来，都变成了小菜。神狂起来，无道德可言，没道理可讲，道德和道理，都是人事，与神无关，神只管狂。神没有是非、对错、善恶、好坏之分，唯有意志，很单纯。神不需要有思想，但要有自由，自由起来就会发狂，狂得惊天动地，宇宙乱了套。

速须佐之男命去高天原找他的姐姐天照大神，一任性就闹起来，闹得天照大神躲进天之石屋里，高天原黑了，万物都要死去，他好玩而已害得八百万众神都来了，连哄带骗，使天照大神出了石屋，于是，高天原恢复了光明，万物又开始生长。众神决议，惩罚了恶作剧者。

速须佐之男命后来乞食于食物之神，那神从口鼻和肛门里取出食物，做成食品给他吃，被他看见，嫌脏，将那神给杀了，并用那神的身体，造出了人类的食品。接着，他为了拯救人类，又斩杀了八岐大蛇，从此开国。

从大闹高天原，到斩八岐蛇开国，他是那么率性，不像中国文化里的孙悟空，需要带上紧箍，并以咒语提示，历经磨难，才能修成正果。对于他来说，自由意志是因，开国是果，自然而然，也许，他如此顺利，是因为他出身于神系，而孙悟空，只是从石头里蹦出来野猴子。

而吉田松阴，就如同速须佐之男命大闹高天原一样，闹得幕府胆战心惊，他当然要受惩罚，神可以有自由意志，他不能有；神可以不死，他必须死。我们都认为他死了，可他却认为，自己忠魂不灭，可以七生报国。

这种七生报国的思想，山本常朝也有，在《叶隐闲谈》里，他说，与其成佛，还不如做锅岛藩武士，哪怕轮回七次，也要生为锅岛藩武士。

开创明治时代的人物，身上都有一股子这样的狂气，可这样的狂气，同时代的中国人，曾、左、李，包括后来的光绪帝，谁有？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疲软了，狂气不得出，怎能开创历史？

除了豪迈的狂气，武士道里还有股子阴冷，那阴冷或许来自《古事记》里的王子倭建命，他从小就会不择手段的谋杀，长大以后，诸侯们都在他阴冷的杀气里一个个倒下，杀人的血腥，激发了他的诗情，他还多愁善感。这种阴冷，也传给了《叶隐》，对于残酷的死，而有诗兴。明治时代的思想者们，多是狂者，狂能开创历史，当福泽谕吉高举“脱亚入欧”旗帜，推

动文明转型，实现国策转变时，他是狂者。

可当日本同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我们就感受到了“脱亚入欧”的狂气里，带有帝国主义的阴冷杀气。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不再是天下观里的道理，而是因为“入欧”了，欧洲人侵略中国，它理所当然要加入。

当植木枝盛以“我就是神”来推动自由民权运动时，我们禁不住要为他的狂气喝彩，可仔细一看，就发现，原来运动的神圣目的，同样走向了阴冷的国家主义时，我们又不禁要为这种来自武士道的狂气感到悲哀。

明治时期，武士道，通过《军人敕谕》成为军人之道，通过《教育敕谕》成为国民之道，武士的狂气，当然就变成了日本文明的狂气。武士之狂，还是个体，多少还具有审美的价值。而文明发狂，毫无疑问，那就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注意。

（作者乃是本书的译者，特此注明。）

（日）山本常朝 口述、（日）田代阵基 笔录：《叶隐闻书》，李冬君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32元。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书评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一

《叶隐》（Hagakure），又称《叶隐闻书》，为江户时代中期（1716年）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传述自己做武士的心得，由一个名叫田代阵基（Tashiro Tsuramoto）的武士笔录，历时7年而成书。“叶隐”，在日文中指树木的叶荫，暗喻在不为人所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全书11卷，1200多节，是关于武士的心性修养、处世之道的集大成经典文本，是武家的“论语”（此书面世之初，在藩内确被一度称为“锅岛论语”）。

既然是“论语”，内容便注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事实上，《叶隐》通篇所记述的，净是叫人如何婉拒来自讨厌的上司的喝酒的邀请，补救部下失败的方法，避免在人前打哈欠的窍门等等，近乎于现代公司职员教育或礼仪作法教养一类的书籍。至少不是美化死，教人“自决”的读物，正如常朝自己所说：“我也是人，欢喜活着这件事。”书中甚至有对男色（即所谓“众道”，男性同性恋）搞法的说明，这与一般意义上或想象中的“武士道”之间乖离之大，几不可同日而语。正因此，战后，出于所谓“宣扬军国主义”的误读，一度被禁。近年来，又作为东洋人的深度生活哲学被重新评价。

毋庸讳言，在《叶隐》卷帙可观的记述中，最震慑心魄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关于武士应如何面对死亡的阐释——人何以在紧急关头果断、决绝、毫不留恋地选择死。对于通常人对生命的执着，武士道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功名利禄都是梦幻一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对为“上方风”（指大阪、江户等地的浮华之风）的轻薄武士道所诟病的所谓“无目标的死，毫无意义，似犬死”的说教，《叶隐》的回答是：“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能否按既定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不了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在常朝众多的关于死亡的理论预设中，没有什么比“常住死身”（Jyojyushinimi）一语更富哲学意味，也更光辉的了，这令人联想到现代生命哲学中加缪的那个著名命题（“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常朝在这里搁下的，不是诸如在重大关头死给人看的话，其判断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做死的觉悟。正因为有如此“必死”之觉悟，其在《叶隐》那段著名的“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亡之路”的记述中如此归纳道：“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

但正是这条记述，后来却被脱开《叶隐》的整体背景，单抽出来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内核加以曲解，广为误读，并以此来背书太平洋战争中青年人的“玉碎”和“自决”——此乃《叶隐》一度成为“问题书籍”之由来。

武士道精神，即“大和魂”，乃封建统治集团对武士提出的以“忠义”、“勇敢”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武士道虽然没有形成成文的制度典章和完整的体系，但却是约束武士行为的内在律法，也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与武士居

“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其行为方式、人生哲学，为农工商“三民”景仰备至，争相效颦的社会现实是相辅相成的。彼时，有所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说法。

风尚自上而下，风气自下而上。明治维新之后，尽管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精神却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那样：“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的头上放射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日本的道德之路。”

应该指出，在曾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源远流长的武士道体系中，《叶隐》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非主流”，与代表“主流”的山鹿素行所倡导的儒学武士道有不小的距离。后者之所以被常朝奚落为“‘上方风’的骄矜的武士道”，是因为“忠义”本身，并非像山鹿从学理上冷静分析的那种忠义，而是行为中含带忠义，在行动的时候，达到“为死而狂”的境界。正因为遭到主流的排斥，《叶隐》在问世之初，即使在藩内也曾被列为禁书。

作为曾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外学”之一，儒学从来不曾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而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的整合对象。“和魂英才”正如“和魂洋才”一样，儒学充其量只是被用作某种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朝基于藩国的历史和自身的人生体验，为武士道国学奠定了基础，不是凭孔孟朱子，凭的是一股子发自生命本体的生猛豪放的“狂气”，而后者恰恰是冲着前者发泄而来的。

二

武士道与儒学，或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呢？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忠孝顺位问题。

如果把源自中国儒学的忠、孝、义、勇、名誉、礼、诚、克己、仁等价值比作树上的果实的话，那么中国儒学之树上最大、最沉重、最夺目的“果实”是孝，而之于武士道之树则是忠。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指出：“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武士道德的核心是维护主从关系的稳定，主张随时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所以，“忠”，并且只有“忠”才是武士奉行的最高标准。

中国传统儒学以孝为本，尽孝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作为对儒家“士道论”的反动，武士道论者认为前者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面对死时却不干脆地死，无非是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尽管日本近世儒学提倡忠孝一致，但却强调忠的大义名分。所谓“君不君，而臣不可不臣”，故“忠”是第一位的，是绝对价值，而“孝”是第二位的，是相对价值。李泽厚在论及中日两国文化心理的异同时指出：“中国的五伦关系以‘孝亲’为核心，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忠君（神）’为基础，前者的对象、范围及关系非常具体、世俗、有限和相对自由，后者则更为抽象、超越、无限和非常严格。”

对普通平民而言，忠优于孝的观念虽不如武士那样强烈，但却有别于中国。在他们看来，“孝，只是一种漠然的对父母的尊重。”日本史家依田憇家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武士阶级的基本关系主要是对主君的忠，而不是同族团的结合。即使在农村，也已由同族团的结合过渡到地缘的村组结合。从社会整体来看，已从亲族协作型过渡到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

中国以血缘为纽带，构成了庞大而扩展的放射性社会关系网。这一传统与日本主要并不以血缘而是以行业、集团、地缘、村组来维系和延续名义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颇为不同。在日本，从古至今，经常可以看到由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保护门户。在中国，非血缘的继承多属例外性质。可以说，中国更重以血缘为基础的实质的“家”，日本更重以主从为基础的名份的“家”；前者强调亲族间广泛而自然的纵横联系，后者重视集团内人为而严格的等级秩序。

尽管武士道的起源，除上述问题之外，还能从日本的民族性格、审美气质、地缘条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找到依据，但在忠孝顺位问题上，日本武士道与中国儒学的分野之大、之本质，注定了这两棵结大致雷同果实的树，最终成为不同的树种。正因为“忠”不再以“孝”为本（在中国，出于对血缘的重视，历来把“孝”作为“忠”的基础。《论语》中即有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记述），而是完全凌驾于“孝”之上，获得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使主要源于中国儒家道德而又有别于它的武士道，往往被认为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鲜花”。日本现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则把武士道看成“日本文化的古层”。

但这种文化分野的进一步发展，却导致了后来对日本民族来说一坏一好的两种结果：一是天皇崇拜。如果说江户时期武士的“忠”还只是局限于藩国的狭小天地，指向性非常明确，是一种以身份关系为前提的前近代观念，对平民而言，由于长期的武家统治，天皇在他们心中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的话，经过幕末民族主义者“解冻”天皇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维新时期统治者以近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为名，采取一系列重树天皇绝对权威的措施，极大强化了全体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认同感。同时，也坐下了太平洋战争时，“神风特攻队”员驾驶“零式”战斗机，高呼“天皇万岁”，冲向美国军舰的“玉碎”悲剧的病灶——这是坏的一面。

也有好的一面：包括武士道、“大和魂”在内的日本文化土壤，对其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战后的迅速发展似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学人以“虚拟的血缘社会”来描述，颇为恰当。昔日的家族、村落，今天的“会社”、“集团”，均非以真正的血缘或亲情构成、联结，它吸收了各种养子、仆从、雇员，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契约关系的利害共通、共存共荣的仿佛有亲密血缘的从属关系。它颇有点像马克思·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武士道比儒家更富于“现代性”呢？

三

如果说，在江户时代，武士道与日本国学家极力倡导的“物哀”传统、神国思想成为共同构成“大和魂”(Yamatodamashii)的三大基石，使单一民族的日本基本具备了文化上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的话，那么，近现代，作为“大和魂”主轴的武士道思想的坐大，不能不提到两个人：新渡户稻造和三岛由纪夫。

先说前者。新渡户稻造，为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京都帝大教授、东京帝大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及战前的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等职。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之一，其肖像至今印在5000日元的纸钞上。新渡户虽然有名，但其最初的成名，却是由于一部书，即《武士道》(Bushido)。

那么，新渡户何以想起写这样一部书呢？其在《武士道》第一版序言中如是说：“此书的直接开端，是吾妻常常问我，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或风俗(指武士道)在日本很普遍呢？”在其美国夫人玛丽的眼里，武士道的规矩，是很野蛮的。玛丽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对日本的“偏见”。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由于其在战争中的暴行(如“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等)，仍不见容于列强，被视为野蛮国。所以，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该书于甲午战争后4年、日俄战争前5年的1899年(明治32年)在美国出版。单看出版年代就知道，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一方面，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

以经玛丽夫人捉刀、通俗晓畅的英文写就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激越、抒情的昂扬礼赞。由于新渡户本人幼年时曾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因此，在对西洋人介绍时，与别的外国日本研究者至多充当一个“辩护律师”不同的是，“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颇能进入角色，入木三分。其对东洋文化“深层推销”，令人想到后来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推介。

书甫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极短的时间被翻译成数种文字风靡各国。仅其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间就再版了10次。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曾亲读此书，还特意买来分赠友人。回过头来看，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一代人的时间迅速崛起而免于被列强过度打压、妖魔化，不能不说拜《武士道》之所赐大焉。新渡户也因此而成为解读日本精神、伦理的权威，名扬世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明治天皇亲自召其进宫，玛丽夫人也陪同到皇宫拜谒。

在卢沟桥事变勃发的翌年(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日文版《武士道》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在日本的权威“铁定版”。在书的第16章《武士道还活着吗？》中，作者断言：“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他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来说是清晰可见的。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在这里，武士道已然成了为日本的殖民和侵略战争辩护，使其正当化、合法化的工具。

新渡户本人从1920年起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7年，负责日本在国际上的外宣工作。回国后就任贵族院议员，并作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出兵东北辩护，直到1933年去世。

再说三岛由纪夫。作为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三岛曾数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文坛公认的怪异鬼才。短短的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诗歌、文论和散文，构筑了一个令人致幻的文学迷宫。其思想极其复杂，很难简单评价。大体说来，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而其古典主义，则又是和洋古典主义的混合，来源有二：一是日本的古典，二是古希腊。

前者，一方面，从近世井原西鹤的“男色”审美情趣中获得日本古典的情绪性和感受性，通过性倒错来表现其理想中的男性美；另一方面，受日本近世古典《叶隐》的大义忠主君思想的影响，并将这种武士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理念。从这里出发，从战后解体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躯壳中，剥离出“文化概念的天皇”的理念，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文化天皇观”，并在创作中加以抽象化、美化。他强调，“古典主义的极至的秘库就是天皇，而且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在不断的美的激发和伦理的激发的灵感中，就有天皇的意义。”可以说，三岛念兹在兹的“终极之美”方程式的核心，就是天皇，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重新树立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精神权威。尽管他追求的是所谓的“文化天皇”，但由于美被绝对化，三岛美学的“金阁寺”在令人感到美轮美奂的同时，也带有某种压力。《叶隐》对三岛影响之深，几乎贯穿一生：不仅是他学生时代最爱读的三种书之一（其他两种是《上田秋成全集》和法国早夭的天才作家雷蒙·哈狄格（Raymond Radiguet）的《伯爵的舞会》），更在其自戕前三年42岁的时候，写作了《叶隐入门》。

三岛显然是通过修习《叶隐》来思考、面对和接近死亡。“在如梦一般无足轻重的十五年里，每天每天都觉着，这是最后了。就这样，每一瞬间，每一天都在积甸着什么，过去的积甸将会在某一时刻完成他的使命。这就是《叶隐》所教喻的生的哲学的根本理念。”

对三岛来说，“人只能为正确的目的而死”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在国家里营生，是否真的可以把自己限定在那样的正确目的之上呢？或者，不把国家作为前提，是否有机会完全超越国家，作为个体在生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完全为了人类的正确目的而死呢？”这样的问题不得不搞清楚。因此，“死的绝对观念和被称作‘正义’的现实观念之间的龃龉永远都会发生。因为对死的目的正确与否的定性，说不定会因历史而在十年、数十年、百年或两百年后发生逆转，被重新修正也未可知。”

就像对于死的目的追问，没有正确答案一样，三岛认为，人选择死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死的基准，正如我们活着就是被什么东西所选择的结果一样。我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生，便也不能最终选择死。”结果，人类就只能堕落到连死也不能自由选择的泥潭，这是人生的一大虚无。他认为纵然是《叶隐》，在生死关头，虽以死相谏，但却不能说是“选择死”。

“那么，生者面对死亡是怎样一回事呢？《叶隐》在这种情况下，提示了行动的纯粹性，肯定一种很高的情热及其能量，并肯定由此而生的所有种类的死。”“我们常常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人可以为了某种思想或理想而死。但《叶隐》主张，即使是最不可饶恕的死，哪怕是那种无花无果的犬死，也应该有作为人的死之尊严。如果我们尊重人的生的尊严的话，为什么可以置死的尊严于不顾？对任何死亡，都不能妄称犬死。”

经过如此抽象、繁冗的关于死的形而上思辨之后，三岛虽然认同《叶隐》的所谓“生死关头，以死相谏”的结论，但却附加了一个条件：这种死必须是一种美的死。这正是三岛绝对主义美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美的方程式链接到武士道、“大和魂”的内在精神资源的秘密通道。

所以，1970年11月25日，发生于东京市谷陆上自卫队营地的切腹自戕事件，绝非偶然，而是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精心策划的一出舞台剧的高潮：穿什么样的制服，用什么样的短刀，以何种方式切腹，多长时间断气，谁来“介错”……所有这一切，完全按照武士《切腹指南》的程序严格操作，沉着冷静，纹丝不乱，连露台外面广场上集结的近千名自卫队员的震天怒吼仿佛都听而不闻。

“我们看到，战后的日本沉湎于经济繁荣的虚幻之中，忘记了国家的基础，丧失了国民精神，舍本求末，陷入敷衍和伪善，自动跳进了灵魂空虚的深渊。我们强压怒火，看到政治仅仅是为掩饰矛盾、保身、权欲和伪善而效劳，国家的百年大计托付给外国，战败的屈辱未雪而只是蒙受欺骗，日本人自己在亵渎日本的传统和历史。我们梦想，现在唯有自卫队才保留着真正的日本、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武士魂……”

以如此滴血溅泪的《檄文》号召自卫队“决起”失败后，绝望的三岛由纪夫跪坐在地板上，上身挺直，当他缓缓操起短刀实施其最后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陶醉。

（日）山本常朝 口述、（日）田代阵基 笔录：《叶隐闻书》，李冬君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32元

音乐就是自我殉道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一本传记写的好,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或许是“出入自如”。所谓“出”, 当然是指对传主的生平大事, 都有较详尽的交代; 所谓“入”, 则是指作者对于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与毕生关怀, 应当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性理解, 假如能进一步移情, 观照出传主精神世界的大体轮廓, 则够得上是传记中的上品。

这本关于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伦·古尔德的传记, 其实是我早先阅读的漏网之鱼。我在北京与上海的书店里, 都没有发现该书, 而最终只能通过按图索骥, 倚靠网上书店才购得。之所以还在这里撰文推荐, 首先自然是这本传记写的生趣盎然, 够得上传记作品中的佳品, 当然也需要提醒读者的是, 这当中的翻译错误, 也比比皆是, 需要小心甄别; 而最为重要的缘由, 则是因为笔者对古尔德偏爱的私心作祟, 不得不写下几段文字, 与大家分享关于这位音乐家的种种。

掐指算来, 格伦·古尔德因中风去世, 距今已有 25 年。去世之日, 他的 50 岁生日刚刚过去 10 天, 就以这样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方式走到了生命尽头。

在他的墓碑前的石板上, 刻着一段《哥德堡变奏曲》的起始音符, 这部作品也一直被认为是代表了古尔德对巴赫的经典诠释, 也作为一个神秘的符号见证了其音乐人生的首尾。他录制的的第一张唱片是 1955 年版的《哥德堡变奏曲》, 而在 1981 年, 也就是临终前录制的最后一张唱片, 也正是这首《哥德堡变奏曲》。

再怎么夸大这部作品对于古尔德的意义, 恐怕也并不为过。事实上, 在 10 余年的听乐生涯里, 我对巴赫音乐的某种顿悟, 就来自于古尔德的演奏。要将巴赫演奏出某种清澈、神圣的意味, 并非容易之举。对于今天的现代人而言, 要进入巴赫那个时代的音乐精神氛围, 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不易的要求。也正是如此, 20 世纪的钢琴演奏家, 多是选择浪漫派作品为主, 为数不多演奏巴赫的钢琴家, 虽然也能自成一格, 但是他们所演绎的巴赫, 未免不沾染了“浪漫派”的浓重气息, 只要看看佩莱西亚和阿格里奇演奏的巴赫, 便可窥见一斑。

如果有人因此认为, 古尔德或许就是一位心思纯净的音乐家, 那么这无疑大错特错, 古尔德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 都似乎与巴赫的音乐相差甚远, 当然, 巴赫本人也曾经在大街上好勇斗狠, 全无音乐里的清澈平和。但是看过古尔德演奏的人们, 会发现十分怪异, 因为他总是弓着背, 身体几乎就要贴上琴键, 他弹琴时的双手也比一般演奏者更平, 远远看去, 就如同“钢琴前的霍金”, 身体佝偻成一团, 只剩下几个手指在那里不停的跳动。

更让人感觉困惑与不解的, 则是他比较诡异的音乐趣味。除开巴赫, 他还喜欢勋伯格这位“无调性大师”, 熟悉音乐史的自然明白, 巴赫代表的复调音乐与勋伯格开启的无调性音乐传统, 本是水火不容, 古尔德同时接纳一正一反, 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本传记描述了很多古尔德如何热爱勋伯格的情节, 但是并未说明, 在巴赫与勋伯格之间, 到底存在哪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古尔德非常讨厌莫扎特, 这位古典音乐史上人人都爱的“小甜甜”。他给出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 莫扎特的音乐是“享乐主义”式的。他最让人诧异的“即兴创作”能力, 在古尔德看来, 本质上是将音乐引向肤浅化与庸俗化的阶段。如此惊世骇俗的观点, 自然引发了他与一帮音乐专家的争论。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 艺术的目的是“终其一生营造一种惊异与安详的状态”, 短期的目的则是“救世济人”, 而音乐会、表演、展览和观众的欢呼, 都是虚假的、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如果说巴赫的音乐最终是要在一种音乐的秩序中达成与上帝的和解, 那么勋伯格提出的则是“和声即情感”, 要用音乐的强度表达最深的情感。

或许这已经暗示了, 古尔德的心灵, 乃是一个分裂的秩序。他一方面内心挣扎, 充满了情感表达的需求, 另一方面又对世俗与平庸的生活感觉厌恶, 这体现在他常常是深居简出, 只依靠电话与人联络, 而当他内心风暴舒卷之时, 他甚至独自前往北极附近, 只为获得某种极端神秘的体验。

但是这种分裂并未让他的心灵彻底被彻底的现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的那种孤独感, 其实是一种不断追求完美的孤独经验, 就如同一种“隐退的完美感”。这让他常常在音乐中, 发掘出古典世界的“神性”体验。当年与古尔德一起创作小



说《战争》的小说家莫西芬德利在看到他演奏《哥德堡变奏曲》的结尾处时放声痛哭，在他看来，古尔德在那里已经找到了“神性”。

或许我们不应该夸大古尔德的精神成就，因为尽管他在1981年再录《哥德堡变奏曲》时，已经对1955年的那个初出茅庐时的版本表示过种种不屑，但是他是否真正追求到试巴赫音乐中的完美秩序，看起来颇让人怀疑。他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材料来佐证这一切，但是他曾经为自己定下“为自我殉道而确定你的探索”的目标，却在他的演奏生涯中毫无疑问的实现了。

[美]弗里德里克：《格伦·古尔德的生活与艺术》，魏柯玲、刘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5月。

话题

最后的出版人

书评人 莫之许（北京，mozhibu@hotmail.com）

继起点中文网等原创文学网站之后，新浪搜狐腾讯等也相继试水收费阅读，作为已经牺牲的先烈电子阅读网站“博库”的前员工，我的看法是，电子阅读已不可阻挡，但收费阅读未必正确。

先说电子阅读不可阻挡。许多人都以平面阅读习惯难以更改，和电子阅读的不方便不舒适为理由，认为电子阅读难以取代平面阅读。我认为，彻底取代诚然不可能，但是，以下三个因素注定了电子阅读必将超过平面阅读，并最终将后者降低到广播相对于电视的地位：

由平面阅读转为电子阅读的所谓困难，只局限于那些有长期平面阅读历史同时又突然转向电子阅读的人群，在互联网和手机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并不存在转向困难。

电子阅读的易得性是平面阅读所不可比拟的，这一点毋庸赘述，考虑到无线通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阅读以至声讯阅读的发展，应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电子阅读的体验也是平面所不可比拟的，及时、互动、多媒体、随处可得。这些优势，是平面阅读永远的劣势。因此，我敢于断言，在不远的将来，以整个国民阅读时间来计算，电子阅读就将超过平面阅读，其实，我本人目前用于电子阅读的时间就已经快接近了，比如我唯一长期购买的《体坛周报》和许多期刊，已经退出了我的平面阅读时间，之所以尚有相当多的平面阅读，仅仅在于书籍这一载体目前依旧以纸质为载体，而这就是本文我要谈的根本，即电子阅读和网络内容的涌现，将怎样地影响出版行业。

一、网络内容在短期内有利于出版，但在中长期内将彻底摧毁出版

短期有利：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发表的门槛；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言论尚不充分自由的国度，网络的出现也突破了内容发表的管制；这两点合并造成了网络内容在一段时间内的繁荣甚至井喷，从而极大地提供了内容增量，为传统出版提供了更大的挑选余地，近年来走红的《诛仙》、《鬼吹灯》等图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更不用说活跃在各大论坛和博客的写手纷纷向专栏作家转型所带来的图书品种了。

长期摧毁：正因为网络内容的不需要发表，使得传统出版中的关系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在传统出版中，出版方拥有对作品的审阅权和市场准入权，前者依托精英化的文化势力，提供对作品的水平鉴定；后者则依托市场运作，提供对作品的商业鉴定。而在网络内容发表的前提下，这两种权力将不可避免地旁落直到最后消亡，首先，网络的开放特性，使得专业人士也可以加入到对网络内容的水平鉴定中来，特定编辑出版人士的意见从此不再具备任何的权威性；其次，网络内容向所有读者开放所提供的信息反馈，同样使得所谓专业的商业鉴定也成为了虚话，建立在无数人阅读基础上的点击、回复、推荐，将比如何特定编辑出版人士的商业鉴定更为牢靠。最后，失去了对作品的审阅权和市场准入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作品的资源控制权，作者与出版方之间的关系从此将发生颠倒。

二、网络运营在短期内将有利于出版，但在中长期也将彻底摧毁出版

短期有利：在短期内，网站向读者提供电子阅读——是采用直接收费的方式，还是采用免费+广告的方式——对出版社都是利好，因为这提供了新的收入渠道，尤其是那些有着相当存量资源的出版社，可以通过收费下载，付费阅读、电子书馆藏书目分成等多种形式，在网络上获得不菲的收入。即使是那些以创新图书为主的出版商，也依旧可以分享新阅读形式所带来的增量。

长期摧毁：但是，网络运营将对图书尤其是一般图书的出版带来颠覆性变化。长期以来，一般图书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寄存代销+自由定价基础之上，相对自由的定价权是一般图书出版赖以生存的最大保障。可是，无论是收费下载、付费阅读还是按需出版，都是对这一自由定价权的颠覆。在未来，获得同样的内容，将具有若干不同的价格，而这将最终摧毁一般出版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作者通过网络运营所获得的收入超过纸质图书的收入——这并非不可想象的——平面出版就将沦为拣剩饭的角色，而我想，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三、出版人利用网络短期内有利，中长期也将彻底被摧毁

由于网络拓展了表达的空间，也刺激了表达的欲望，使得有眼光的出版人在目前尚可以利用自身的编辑眼光和市场洞察，在网络上挖掘中意的作者和出版资源——事实上，我的绝大部分图书都有网络的影子，无论是出版信息的获得、作者、翻译者，都通过网络而结缘，因此，网络这一手段在短期内是有利于出版人的，它带来了更便捷的沟通，更充分的了解和更人性化的关系。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开放的网络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及时、可互动，这将使得作者对自身内容价值的把握和市场潜力的理解更清晰，而尤为关键的是，当一个作者面临无数读者的时候，任何特定个体的编辑眼光和市场洞察，都及不上大群体的智慧的集中，从而，出版人所赖以生存的编辑眼光也好，市场洞察也好，都将成为幻觉而已。

四、最后的出版人

综上所述，出版人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审阅权、市场准入权，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定价的的大部分主动权，同时，在网络所提供的及时和广大的互动交流下，出版人的编辑眼光与市场洞察也将变得不再重要，那么，出版是否就该消亡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出版人还有最后的一个堡垒，那就是最后买单人的地位和商业操作的技能。近来热门的“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和哈里·波 7，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形下，作者和作品已经不需要审阅和商业判断，但却需要商业操作，需要由一个具体的责任人来分配关涉到作者和销售方等的利益，换句话说，这更类似于商业大片的制片人的角色，而在在我看来，这可能也就是出版人最后角色了。

此外，出版人还可以屈尊俯就，成为受欢迎作者的跟班——经纪人，利用自己的编辑技能和市场能力，为作者服务。

因此，出版人这一兼具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的职业——这也是出版人的职业自豪之所在，大概会最终进入到排字工人等永久消失职业的名单当中，而代之以制作人或经纪人这样纯粹商业的角色。当然，这一过程或许尚需进行若干年，但却一定会到来。

声色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

书评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的《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有6000多字，引发出来的大批判文字则数以百倍于此，其中有部分批判文章当年结集出版，共计有200多页。批判的规模堪称宏大——



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宏大了。

我有个朋友，那时候在北大荒当农工，免不了也要加入战团，批判一通。他没有看过电影，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批判一部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就像和一团空气作战。照例，敌人几乎是假想的，只有《人民日报》的文章提供了少数端倪。然而，这种战斗方式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的前半生、整个国家和无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置身在这样的假想的战斗之中。

我不禁想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这部电影时的情形。他置身在他从没有见过的情景之中，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的海洋，每一次拍摄都是一场小小的战斗：让主人相信他在按照预先商定好的方案工作，同时猎取他想要的镜头。安东尼奥尼的战斗和他的战斗并没有两样。他们都在挑战一种无从了解的事物。

现在，安东尼奥尼死了。我觉得他应该从网上下载一个盗版的《中国》，老老实实地看上一遍。也许他来不及。他的后半生太忙。太多假想的敌人等着他恢复原来的面目；他甚至不知道大师的死，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如果不是我提起，不过是他记忆的一块残片罢了。

《人民日报》的曲笔

没有《中国》这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无损于安东尼奥尼在电影界的威望。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想像这种威望意味着什么了。他死后，我发邮件给一位朋友，他很快回了信，“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我知道他对电影的热爱，就装作没感觉到这句话里头的矫情。就在一天之前，我刚刚和他谈起英格玛·伯格曼的死。大师老了，也难免要走向死亡。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相继离去，几乎是在同一天。这让人多少有一点意外。“我们距离他们的时代太远了”，我认为这个评价在此刻是恰当的。

《中国》让安东尼奥尼意外卷入了一场暧昧的意识形态争论。被8亿人齐声责骂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肯定不会比某个亲近的朋友反目更严重，真正让安东尼奥尼沮丧的是，引起争论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安东尼奥尼本人的历史观如何，而是他没有尽到为客之道。

《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第二段劈头说，“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哀怨被朋友所伤害，其实意味深长，里面包含的复杂的批评意味，只有熟悉当时政论文体的人，才会体会到。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是中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共同主持的政治形象工程。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如批判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在此之前，整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严格地隔绝在西方的摄影机之外。然而，安东尼奥尼竟然辜负了红色中国的信任。《人民日报》上委婉而又鲜明的表达，是中国文字中特有的曲笔，这种修辞技巧毋宁是在敲打意大利政府的失察。

事情的起因却是再正常不过的。1970年底，中国和意大利建交了，照老思路，难免要文化搭台，唱唱别的什么剧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想拍摄中国，中国也想向西方传递信息。安东尼奥尼被选为导演，从意大利方面来说，是因为他在电影业里的绝对威望，对中国来说，则取其左翼的思想倾向。这个安排，双方虽说未必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

安东尼奥尼会从朋友变成敌人，是那个3小时又40分钟之后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防范也并不严密。尽管拍摄行程经过了周密的安排，时间也大大压缩了，但是他还是不止一次地拍到了日程表之外的事物。这些画面未经检查，自然，也没有剪掉再让他带出中国。谚语有云，“魔鬼在细节里面”；即使是最严密的意识形态审查机关，事情也同样是这样。安东尼奥尼回到意大利，对红色中国来说，已经是放虎归山。除了通过外交途径，阻碍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放映，剩下的事情，只能组织长于曲笔的汉语写手，安排全国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对披着羊皮的安东尼奥尼大举笔伐而已了。

零零碎碎的真实

在苏州，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家面馆。一位老师傅在宽汤里捞面。“很难相信中国发明了一切的说法”，旁白里一本正经地说，“包括宽面条”。对意大利人来说，这是一句浅白的幽默。中国人最大的发明，当然不是宽面条，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助手和女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里卡·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女儿。像1960年代欧洲许多心怀左倾梦想的姑娘一样，除了到广场上去反对资本主义，到中国去是她的梦想之一。这次梦想之旅最后变成了她的蜜月旅行。

很多人像安东尼奥尼一样被邀请到中国来，可是从来没有引起波折。1955年，萨特来过；他登上了天安门，观看了潮

水一样的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万岁。1960年，埃德加·斯诺故地重游，见到了许多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领导着整个中国；据说斯诺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因此，他写的两本书《今日红色中国》和《漫长的革命》在美国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1965年，安德烈·马尔罗带着戴高乐的指令会见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里写了不小的篇幅，有人说他是“恬不知耻的胡编”，说他只和毛泽东待了三十分钟时间，双方仅仅来得及交换一些外交辞令。连亨利·卡特一布勒松也在1959年被邀请到中国，作为西方最有名的摄影师，中国认为他可以用相机纪录建国十周年以来的伟大成就。

邀请的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一些有迹可循，有一些，至今沉睡在历史的某个角落之中。

可以肯定，在欧洲，对共产主义试验的态度是复杂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气氛，和1980年代后期一边倒的景象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艺术家一定要折衷。我见过布勒松在社会主义中国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产生影响。但是，过了几年，布勒松突然被当作资产阶级摄影界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历史有其伏笔，可见，凡事有它自己的原因。

关于中国，安东尼奥尼有自己的想像。“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有人对此感到愤慨。但这些话可以理解为对完全无法确认的状态的描述。

我很不喜欢电影里某些面部的特写。大多数几乎是一种强迫。安东尼奥尼在这里利用了权力；尤其是进入红色中国的外国人的特殊权力。然而，我怀着矛盾的心情理解了他。

来中国的这一年，安东尼奥尼已经60岁了。对这个年龄来说，忠实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惜，对大多数人来说，发现自己和忠实于自己的发现，都不重要；纪录片在他们眼里意味着真实；而且是绝对的、本质上的真实。为此，要么是一摊不耻于人民的臭狗屎，要么被供奉为历史本身；《中国》和它的作者，免不了在两种极端之间荡秋千。

大多数凡事讲本质、讲绝对的人，是被凡事讲本质、讲绝对的教育搞坏了头脑。真实是有的，但只是有限的经验里能够被言述的一小部分而已。安东尼奥尼在电影里引用了中国的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他想以此表达真实的局限和自己的谦恭，却被看作是包藏祸心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虚伪的自白。《中国》里面的真实是阶段性的，并且零零碎碎；尽管有逻辑，却没有体系可言。这本来是人生的真相。可是安东尼奥尼离开中国两年之后，许多在中国的荒僻角落里改天换地的年轻人，怀着对前途的苦闷，连夜赶写了许多批判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反复援引绝对和本质，批判这种零碎的和没有体系的真实。好像堂吉珂德刺向虚空的长矛，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同龄人想寻求的并非真实，而是一个确证；对已经褪色的梦想的确证。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阅读报告独立发行，欢迎订阅，谢绝转载。